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73期

目 录

【专稿】

叶维丽 马笑冬，你的话对谁说？
——老三届理想主义祭

【怀人】

华聿杜 东厢记——我的忘年交
王学礼 史东山·潘汉年·关露
——孙谦在电影剧作所的见闻

【述往】

李豫生 染血的回忆（下）（1967·9—1968·7）
——人大两派群众组织割据武斗的11个月
李耿立 艰难岁月——我的中学生活（1958--1961）

【读书与读片】

方延曦 《王蒙自传》浅议——言之有文，行之不远
启 之 《土地》：中国土改的教科书

【序跋】

丁 东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读《绕不过去的点》
邵 建 罗章龙与周伟德——这也是“绕不过去的点”
无 文 《绕不过去的点》后记

【资料】

清华附中红卫兵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首都兵团《兵团战报》 1966年11月26日

【读者来信】

1. 赵 晖：从毛对邓拓的批评谈起
2. 许绍吉：谈论文集并有问林彪事件
3. 王芳纠错

【本刊声明】

【专稿】

作者按：1980年的“潘晓讨论”轰动中国社会，马笑冬是此文的责任编辑。1988年夏她携子赴美，拿到博士学位后于1999年秋到上海工作。90年代中期我与她在美国波士顿相识，共同做口述成长史，我们的书《动荡的青春》2008年在北京出版。马笑冬生命的最后十多年是在病中度过的。她在冬天出生，“刚出生就会笑”，故名“笑冬”，她也是在冬天走的——2019年11月29号逝于北京，年69岁。

马笑冬，你的话对谁说？

——老三届理想主义祭

叶维丽

2008年夏天，我去看望住在上海的马笑冬，看护她的秀花姐告诉我，她在撕照片呢，随后拿来一只小竹篮，我一看，不是撕，是把照片攥成一个个团儿，总之是毁了，但也有几张完好的，其中一张是她和牛牛在美国波士顿家中，看起来六七岁的牛牛扭头对着相机乐，系着围裙的笑冬笑咪咪地看着孩子，桌子上有盘切开的蛋糕，是在给牛牛过生日吧？

那年去上海时，我和笑冬共同做的口述对话成长史（中文版）《动荡的青春》即将出版，书的扉页上将印出这样一段话：“希望圆圆（叶维丽之子）、牛牛（马笑冬之子）能够懂得一点他们的母亲们及她们那一代人。”我的母子照已经交给了出版社，正需要一张笑冬的，这张照片及时收进了书里。那段话是我写的，后面还有一句：“并以此书献给挚友马笑冬——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一代女性的身影。”

—

1994年我和马笑冬头一次见面，当时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听口音都是北京的，打量一下年龄相仿，最重要的是几句“接头”式的问话：哪一届的？插过队吗？一旦“接通”了，我们几人异口同声：咱们都是老三届的！

我当时正处于“认同危机”中。生活在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美国，耳边不断响着“历史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胜利的欢呼，而其他的经验和探索都被认为是毫无价值和完全失败的。此时英语读书界正流行着几本中国大陆的人写的书，作者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或家属，以张戎的《鸿》为代表。因为从小目睹近亲长辈受难，我明白书中的内容仅是当年实况的一角，写下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都是交代。但同时，这类书籍形成一种话语“尺度”或曰霸权，如果用它来衡量我自己的历史，令我珍视的一些经历将无处置放。我陷入了说不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困境，由此冒出回顾和反思我本人和我们这代人成长历程的想法。但我本人的经验太过单薄，加上读过国内三位学者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对话录，觉得对话的形式很有意思，恰在这时我认识了马笑冬和她的朋友，第二次见面就对她们说了我的想法，她们欣然同意。于是，三个同在波士顿的中国女性，周末轮流去一家，坐下来对着一个小录音机，开始了我们的对谈。带着成年人审视的目光，我们力图重拾少时的记忆，认真清理品味。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轨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不可分，我们的经历既是个体的，也可以看做一代人的几个成长个案，要梳理它们，就不能不讲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能不讲“毛泽东时代”，不能不讲“革命”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不讲文化大革命。我们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质疑对一个复杂时代非黑即白的叙述，另一方面我们须直面那个时代的严重问题。

我读国内“老三届人”的回忆有个印象，即我们的同龄人偏爱上山下乡的“峥嵘岁月”，而对文革往往语焉不详，令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存在着巨大的遗漏。对话中我谈到文革初期卞仲耘校长之死，这是我近三十年来头一次认真地讲述那件对我刺激极深的1966年8月5号发生在我中学校园的暴力事件（北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我说了很多……。我们对话的氛围是友善、宽松、坦率和互信的，这让我愿意说。

马笑冬也开口了，我至今记得她开始时语调中的迟疑和表情的不自然。她讲了1966年8月下旬参与动手打一个女“阶级敌人”的详细经过，然后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安心”“今天是我第一次把它说出来”。当年打人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后来主动承认的有几人？我佩服马笑冬的勇气和真诚，她完全可以什么都不说。

与同龄人共同正视一页不堪回首的往事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数年后我开始调查“八五事件”；马笑冬则从自己家做起。她的母亲文革前是北京一所女中的党支部书记，文

革爆发后挨学生批斗、被剃“阴阳头”。事发后少年马笑冬依然积极革命，心里说服自己不能与群众对立。母亲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即去世，弥留之际说的是那天挨斗事。马笑冬并不知当日详情，更不知父母的真实反应，以为他们就像她那时看到的一样，“和平常差不多”。因为做口述史，笑冬决意去问父亲，让她没想到的是，父亲立刻拿出他对当时情况的详细记述，就好像它一直就放在他的枕边。三名子女中，只有笑冬终于想要知道。书中这一段笑冬的叙述极为感人：她讲到父亲为挨打后的母亲揩伤时“泪如泉涌”，也讲到她读父亲叙述时“几次泣不成声”“艰难地、分了好几次才读完”。我在书中此处发了一点感慨：做历史的人记述事件时往往忽略“感情层面的东西”，而那“才是有血有泪的活历史”。今天重读那几页文字，仿佛再次面见笑冬。她情感充沛，做人做事带着真情善意，和她做朋友是件很容易，也很自然的事。

成长在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又在“性别意识”敏感的美国生活了多年，该如何看待我们那一代女性走过的道路？这是我们的一个话题。笑冬的经历和感受可圈可点。她说起第一次来例假对她的强烈冲击，因为从心底不能接受男女生理上的差异，还说起在云南兵团时对此的“反抗”：从不因来例假歇工，哪怕是冰凉的水田也照样往里跳……。笑冬从小就争强好胜，处处拔尖，用她的话讲：“我一直把自己看做一个特殊的女人，男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我不能接受一般女人的命运。”

笑冬对“一般女人的命运”是敏感的：她的姥姥在得知丈夫“另有新欢”后，在女儿（笑冬母亲）刚满月时“即衔恨而绝”。懂事之后，笑冬的母亲终生拒绝与生父联系。笑冬的两个叔叔“参加革命”后“自由恋爱又结了婚”，乡下的两位婶娘一辈子守活寡……。母亲的身世对少女笑冬是个谜，成年知情后她每一想起“就感到痛楚”；谈到婶婶们的遭遇时，她语调中充满了同情。

对话中笑冬说她“从小就对男女不平等特别敏感”，我问她这与她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有关系吗？她说，“在潜意识里有”，并说，“不想做我妈妈那样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在学校担任领导工作的母亲在家里甘当配角，笑冬父亲则“很有些家长作风”。也许这在“潜意识”里为少女时代的笑冬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她的理想是当女兵，不是一般的女兵，而是像电影《战火中的青春》里女扮男装的高山，能把一个排的男兵管得“服服帖帖”。上中学时笑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就是为了像个女战士”，还特别喜欢军装，“想要一套都快想疯了”。

笑冬崇拜英雄，尤其是保尔和牛虻——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偶像。笑冬解释说，打动

她的是“性格坚韧、有献身精神的人”，是“特别能忍受磨难”“又不诉苦的人”，并说，“这样的人就是革命者的典型”。在对话中，她多次谈到此类英雄对她的人格感召。

笑冬病倒后，我会琢磨她的性格：她太崇尚英雄式的“坚忍”了！人在生活中难免有“苦”，我向她诉过很多苦，她没有向我诉过苦，有时说起一些事，口气是轻描淡写的。一个女性，敏感、浪漫（比我浪漫多了），有着强烈甚至激烈的情感，如何处置几乎人人都会遇到的不顺心、不痛快？不和朋友唠叨唠叨吗？难道就是一味地“坚忍”？那要怎样地忍？

笑冬“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是为“潘晓”“催生”：她是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潘晓讨论”的责任编辑。世上本无“潘晓”其人。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青年》的编辑们敏锐地注意到旧有的意识形态说教已行不通，青年人中多有困惑和苦闷。杂志社通过在学校、工厂和街道召开的座谈会，发现有两个人的情况很具代表性，就请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分别写下来，两人一个叫潘祎（男）另一个叫黄晓菊（女）。马笑冬负责联系黄晓菊，她也是将潘、黄的文字“揉”成一篇的人。《中国青年》发表时，以黄晓菊文中“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问句为标题，取两人名中各一字，以“潘晓来信”的名义登出。笑冬说，“两人原来的文章都很长，我把问题的结构设计好，汲取了原文最精彩的部分，也保留了它们的感情色彩。……我把文章编辑好给黄晓菊看，她说，‘你真下了功夫。’”这篇文章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造成轰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反响，开启了“人生价值的大讨论”，成为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书中笑冬详细地讲述了当年的情况，并说，“在参与‘潘晓讨论’的工作中，我自己也受着教育，我过去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也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挑战，我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我那么投入地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本人和这个讨论有深深的共鸣。”

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了中国人的“形象解放”，尤其是女性形象，在这方面《中国青年》也走在了前面：一反以往只登“女劳模、女民兵、女战士”照，杂志的封面上登出一帧“留着披肩发，充满青春气息”的年轻女性头像。马笑冬与她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杂志同步，她本人的“思想解放”也伴随着“形象解放”，在对话中她饶有兴味地说起经历“女性美觉醒”的过程，头一次在镜中看到上淡妆的自己时，怎么“一下子愣住了”。其实笑冬从小就爱美，文革前夕她才变得“不爱红妆爱武装”。

《中国青年》社记者马笑冬十分活跃，写了不少有社会影响力的报道，涉及了包

括“家庭、婚姻、爱情和性”等方面的话题，也开始关注农村问题和贫困问题。对话中她讲述了对陕北安塞一所农村中学的采访：她进了学生们的窑洞宿舍，里面是“一条从门口到洞底的长炕”，每个孩子有只“比书包小一点”木箱。当日天色已暗，什么也看不清，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打开小木箱让笑冬摸，“好像要展览自己的奖状”，笑冬“摸来摸去，没有摸到比二面馍更好的东西”。最后笑冬说了这样一段话：“告别了孩子们，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儿子，但因为陕北农村和他后来在波士顿的生活环境差距太大，我怕他完全不能理解……。只要想起那些孩子，我就像在他们中间看到了我自己的儿子。有时我甚至想，我今天做咱们这个成长史，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让牛牛看到。”

二

1987年笑冬带着牛牛来到美国，家庭团聚。她不是来陪读，而是自己也读起了研究生。我90年代中期认识她时，她正在东北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熟识了之后，她偶尔会把论文稿拿来请我提意见。文革前笑冬是初中生，后来的经历与英语毫不搭界，她能够在美国啃社会学，令我惊讶。我勉强可算英文科班出身，但用英语读书和写作的过程绝不轻松。每次读她的论文稿我都会说，如果我是你，写不出这样通顺的文字。中国人在美国写人文和社科类博士论文，挑战的不止是语言，更有理念和“框架”，马笑冬付出的汗水和心血可想而知。别忘记，她还是家庭主妇，操心着柴米油盐，更重要的，是她拉扯养育着一个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中国男孩。牛牛的父亲拿到学位后到别处就职，有几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个中的挑战和甘苦只有自知。每一个在美国读学位的中国母亲都有自己的故事。

在美国读书的那些年，马笑冬进入了与女性研究有关的领域，她在对话中说，“在妇女领域可以大有作为，可以做很棒的事。我这些年的研究一直和农村妇女有关。”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改革开放之后江苏某地农村妇女状况的，她的一个精彩观点，是认为中国农村的婆媳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意义上的“婆婆”即将绝迹，马笑冬称她们为“最后一代婆婆”。这个观察至今为国内女性研究界的朋友称道。

再回到我们的成长史。做完口述后，我知道整理拉拉杂杂说了一年左右的口述材料是我的活儿。这时前面提到的第三位参与者表示要撤出。马笑冬在做博士论文，快到冲刺阶段了，我问她是愿意留下还是也撤？她说留。于是我把原本是“三条腿”的

对话修成了“二条腿”——删除了那位朋友的材料，只剩下笑冬和我的。九十年代末我开始做我们成长史的中英文版。笑冬拿到博士学位后很快回国，去上海复旦大学工作。偶尔，我会请她给我发来补充材料，前面提到的笑冬父亲文革记述的那段就是她回国后寄给我的。

三

2001年夏末我去上海找笑冬。那年我休学术假，可以在国内待一年。我手头已经有了中英文两个书稿，读来觉得笑冬的材料少了些，去上海请她先过目，再添些东西。我在她家住了二十多天，朝夕相处。在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笑冬的记忆力有些问题，刚刚发生的事她就忘了，提醒她，她说小事不重要，大事从来不忘，几次三番提醒后，我不知再该怎么说。最后告别时，我想对她说是不是去看看病？话到了嗓子眼，又给咽回去了。后来多次责备自己，当时怎么没有说！

笑冬看了书稿，表示充分肯定，让我挑选可在将来用于书中的她本人的照片，却没有对稿子加一句话。事后我回想，也许那是她脑子出问题的征兆。那年笑冬还不满51岁，太年轻，我也太缺乏医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她除了记忆有时“短路”，其他一切正常，我没有想得太多。她和婆婆住在一起，请了一位保姆照料已经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婆婆的房间最敞亮，阳光充足。笑冬的父亲在北京，她的熟人朋友都在北京。她告诉我，所以到上海来，是为了照顾婆婆。在上海她似乎没有什么朋友，平常和她作伴的，就是保姆吴阿姨。

九月底我们在上海分手，我回北京，她去西安。如果记得不错，那一年的中秋和国庆正好在同一天，我回京和老父亲团聚过节，她是去陕北她的一个“点”，她说回国后她差不多每年的年节都在“点”里和老乡们一起过。她的研究方向是贫困地区妇女婚姻和生育健康，在安徽和陕北都有“点”。陕北那个“点”她80年代当记者时去过，如果我记得不错，就在安塞，那个在小木箱里放着二面馍的孩子们的地方。

笑冬告诉我，因为她总往贫困地区跑，不好好在上海呆着，她复旦的同事们很不理解。

写到这里，我想起她从云南兵团返回北京上了工农兵大学，1976年毕业后再次下乡、去黑龙江莫力达瓦旗插队的事，当时也让周围人很不理解。那时候她二十几岁，这时她早已人到中年。

在上海的那些天，笑冬不止一次跟我说，她在陕北老乡中间感到“自在”，说起那里的婆姨娃娃，她眼睛发亮。她告诉我，她正着手写一篇关于陕北的文章，题目叫“黄土地，我对你说”。

好棒的题目！我连声称赞，“黄土地”仿佛有了灵性，而“我”对那块土地和那里的人们满怀深情。笑冬学中文出身，据一位她云南兵团时代的朋友说，当年她报大学专业时写下了四个字：“立志学文”。1978年她在《北方文学》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四月》的小说。80年代在北京当记者时，她的文采在同行中当属上乘，由她执笔“揉”出“潘晓”，应该不是杂志社的随意决定。多年后，时任《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的彭明说，“经马笑冬编辑的这封信是超标准地合格”。

90年代末马笑冬回国后，很快融入国内女性研究的群体，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2000年2月她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也谈小脚美丑 男权女权》，文字晓畅，观点犀利，读时我想，80年代以记者身份驰骋首都新闻界的马笑冬，经过在海外的“十年磨剑”，现在以学者身份亮相了。作为朋友，我为她高兴，对她充满期许。

四

我知道笑冬被诊断为“早老性老年痴呆”应该是在2003年。那年夏天回国，我又打算去上海，请笑冬给书稿加材料，因为还是觉得她的东西少，两人的分量不平衡。给马笑冬家打电话，吴阿姨告诉我，她去北京看病了。我马上去她北京父亲家中探望，笑冬的态度是拒绝接受医生诊断：“不可能”，她说。记得当时我在心里算了一下笑冬的年龄，尚不满53岁。

从2003年到2019年，生病的马笑冬活了16年，前六年左右在上海家中，由秀花姐照料；后十来年回到北京住在一家养护院。十几年来，只要有可能，我每次回国都会去看她，向照顾她的人了解情况，应该说，我对她晚年的基本情况是知晓的。

2006年春天我在国内，去上海看笑冬。她外表看来还好，我问她每天做些什么，她说捏泥人儿，我听了高兴，她拿来泥人儿让我看，我一摸，硬邦邦，不是新捏的，这时秀花姐一个劲向我摇头。我明白了。在波士顿时，为了补贴家用，笑冬教过美国小学生手工，用彩色橡皮泥捏小泥人和花草，我见过，夸她心灵手巧。笑冬错把当年作今日，确实糊涂了！眼前的小玩意一个个栩栩如生，我爱不释手，很想要一个做纪

念，但又想，还是都留给牛牛吧！我拿起一小盆泥捏的红花，请秀花姐的孙女为我和笑冬照张合影。相片印在了我们书的封背。不知那些花草泥人今在何处？

2007年我去看她，她的背明显地驼了。我们俩到离她家很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我得把几样菜轮流摆在她眼前，否则她只知吃最近的那盘，也不太会给自己夹菜了。

2010年底或是2011年初，我得知马笑冬回到了北京。她入住的爱晚养护院地处大兴，是由废弃的生产队养殖厂房改建的，硬件条件实在不算好，但从院方到护工对笑冬都很呵护，开始的几年，护工称她“马老师”。我想，无论怎样，这个地方有人情味儿，管理也有章法。有时我一个人去看她，有时和朋友一道去。笑冬的情况在持续恶化。看过后我会记下简单的印象，最近几年，每次去都会拍些照。我不是个爱照相的人，但有一种想为笑冬留下存照的冲动。

我心中始终有个问题，就是笑冬还有多少意识和情感？最近三年我每次去笑冬都在沉睡，去年（2019年）十月份那次，她一度睁开了眼睛，叫她，没有反应。出了养护院大门，我在心里想，笑冬来日无多了。

早些年她是有反应的，虽然话已说不清。这里引一段我2012年8月27号看过笑冬后写下的笔记：“……手不能握东西了，但能握人的手。还是笑，护工提到牛牛的名字，表情戚然，似乎冒出一个字‘走’，护工接着说，他走了。”

那几年我每次去、包括和并不认识她的朋友一道去（她们是通过我们的书知道笑冬的），临走时，我都会最后回头再看笑冬一眼，每一次我都从她的眼睛中读出 sadness，仿佛在说：你们都走了，走吧。2013年底，两位女性研究界的朋友去看望笑冬，其中一位很久没见笑冬了，看到很难过，笑冬对她没有反应。她就一面流泪，一面不停地抚摸着笑冬的脸，这时笑冬的眼角流出泪水。朋友告诉我这个情形，我说，“笑冬能哭。我也一直觉得她还是有感觉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灵魂”或是 soul 的说法，当然还有“潜意识”。笑冬的“显意识”混沌了，但她在朋友离开时脸上的表情，在友人抚摸时眼中的泪光，该做如何解释？她的“潜意识”和“潜感情”又有多深？

这些年来，看护笑冬的护工换过几位，她们都是劳动妇女，有着朴素的同情心，尽心尽力；医生刘大夫极为善良敬业，她不止一次和我探讨过笑冬的病。养护院中患有痴呆症的人不少，刘大夫过去不熟悉这个病，就去学习钻研，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上网跟专家上课进修。我对刘大夫充满敬意，对护工大姐们（她们每人看护不止一个不

能自理的病人)十分感激。

听刘大夫和护工们说,“洪常青”不时来看望笑冬,他会对她讲很多话,逗她开心,给她读《动荡的青春》,想方设法激活她深处的记忆,每次他一进屋就高声说,“洪常青来了!”他一来,笑冬“可激动了,比哪天都好”,养护院的人索性叫他“洪常青”。

“洪常青”?是的,他是笑冬在云南兵团文艺宣传队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舞伴,他俩跳的是剧中“常青指路”那一段,他饰洪常青。关于宣传队的事,笑冬在我们的书里说了不少。

笑冬去世后,我联系上了“洪常青”。他告诉我,2006年5月他去上海看望马笑冬,那是两人多年后第一次见面,笑冬不认识他了,他就说,“洪常青来了!”“马笑冬的眼睛立刻亮了”。

他还告诉我,笑冬去世前一年的2018年,正值北京知青赴云南50周年,一些兵团战友结伴看望马笑冬,大家为她哼出“常青指路”那段乐曲,笑冬听得“嘴角抽动,眼中流泪”。

我将信将疑。2018年笑冬各方面的情况已经极为恶劣。但也许那段乐曲真的一直刻在她的意识深处。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笑冬曾经是那么美丽的女子,她爱美,应该有一个美丽的故事。笑冬受过专业体操训练,跳起舞来,有型有款,有模有样。她在《娘子军》中吴清华的剧照,身材修长,面貌姣好,穿着芭蕾舞鞋,踮着脚尖,两拳紧握,两眼炯炯有神,表情坚毅,英姿飒爽,是我们书中最夺目的一张照片,给很多人留下了印象。少年时代的马笑冬崇拜英雄,最想当女战士,就让这张照片永远与她作伴、永远保留在朋友们的记忆中吧。

五

舞台上马笑冬是“吴清华”,现实中马笑冬最出彩的“演出”是“潘晓”责编。不久前,因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人们纷纷回望“踩在1980年这个时代临界点的‘潘晓’形象”,称它为“一根界桩,一个路标”,属于“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万千青年”。一位新闻界资深记者写道,“1980年代社会思想波涛汹涌,其标志是三次大讨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

今后,人们也许会不断地回味“潘晓讨论”的意义。只要它的意义还在,人们就不会也不该忘记“超标准合格”的责编马笑冬。在80年代的首都新闻界,马笑冬是一

位站在潮头的女侠。

马笑冬的步履并没有也不应该止于80年代，或90年代。她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问题。90年代末归国后，她义无反顾地将目光投向贫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她的生命展开了一页新的篇章。可惜啊，笑冬，我们永远听不到你想对“黄土地”说的话了，还有你心中那么多没说出的话……

在一定意义上，马笑冬代表了“老三届人”的“理想主义”，代表了它的极致，它“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和它“与时俱进”的能力。作为一名女性，那代人“理想主义”的偏执极端和高尚美好在马笑冬身上都有体现：青少年时代对“性别差异”的激烈反抗，和成年之后对处于社会底层妇女儿童的关注。我们这代人在凋零。不久前，我插队的山西省山阴县优秀的北京知青杨百揆去世，我不认识杨，但心中戚戚。我认识马，她是我的挚友。此文是我对马笑冬和我们那代“理想主义”朋友们的祭奠。我自少年时代起就不“理想主义”，但我敬重这样的朋友，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

2020年1月16日

美国 波士顿

【怀人】

东厢记——我的忘年交

华聿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牙牙学语的时候，家里就租住了这院子的一角，在这里，我一直生活至文革中下乡插队，因此，这院子便承载了我童年与少年时代的梦。

院子坐北朝南，东西向呈对称性地一隔为二，分别由两个相邻的大门进出，后院有一狭长的天井把东西两院贯通。当年，房东之所以这么设计建造，是打算有朝一日把它分给两个儿子的，这就使我觉得它很像是《红楼梦》中荣宁二府的简缩版。

本是十分典雅的江南居宅，秦檐汉瓦，唐牖宋户，明净的厅堂中铺着深灰色的清水砖，虽然没有花园，但后院的井台边种着草树，高墙上爬满了绿油油的藤萝，却也十分别致。只因为分别租给了十几家居民才使它成了一座大杂院。于是，过道、客厅、楼梯间和灶披间，凡是能利用起来的空

珍的《项脊轩志》，读至“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座院子。

院子里的住户有工人和革命干部，也有教师和职员，资本家和小业主，还有反革命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不过，与外面的世界不同，在我们这个院子里，从来就没有形成鲜明的阶级对立，人以群分的基石还是传统的忠厚与奸诈，而浓浓的小市民习气则又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好时坏的凝固剂或分化剂。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氛围才使得我能够与东厢房的那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成了忘年交。

东西厢房分处于大院的東西院，遥遥相对，但隔着一道墙，我去东厢房是要从后院转过去的。两间厢房都宽不足六尺，长不满一丈。据传，刘禹锡被贬和州时，其居室仅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而刘禹锡却据此而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陋室铭》。我的这位忘年交也能把他的陋室布置得有情有调：其一床、一桌、一椅，外加一书橱，都以毛竹制成，是他家乡宜兴山区的产物，只可惜书橱中的书不是竹简的；桌上有几本他常读的书，其中有郁达夫的小说散文选、芦焚（又名师陀）的《里门拾记》和孔尚任的全版的《桃花扇》，还有一只笔筒，也是竹制的；室内最诱人的是窗棂上悬着的几只拳头般大小的小竹笼，笼中供养的是俗称“叫哥哥”的蝈蝈，每当夏秋季节，这些蝈蝈儿就会鼓动着绿色的翅膀，发出嘹亮的鸣叫声，使得这个繁杂闷热的大院似乎顿时清凉起来。

我一开始到东厢房去，只是为了看那些蝈蝈。我说：“蝈蝈好可爱，为什么要关进笼子呢？”他却说：“和麻雀一样，蝈蝈也是害虫。”我说：“你骗我！它们为什么要大声鸣叫？不是说‘不平则鸣’吗？”他无语。

我后来到东厢房去，是为了看他的书。因为，他的书中有许多吸引我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厢房虽然极小，但好书却能展现一个无限广大的世界。比如，那本《桃花扇》就让我领略了明末清初那些风流才子和风尘女子的别样情怀，懂得了什么是家国恩仇，及李香君和侯方域之间的人格区别。不知为什么，从书中南明“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及他儿子阳羨词派的代表陈维崧，我会联想到眼前的他，不知是否他们都是出生于宜兴的文人的缘故？

他原是一名拉丁文教师，且通文学，又懂中医。因为私下里不慎吐露了几句心里话，被身边的人告密了，于是一夜之间，就成了阶级敌人。他在发配农村劳动改造时得了一身痲病，搞得奄奄一息，后来终于能够回城，在这个东厢房养病了。他的母亲，

一个特别善良又特别坚韧的缠小足的女人，曾生育过十六个孩子，一生操劳，至风烛残年，又来照顾他的生活，就住于二楼一小室之中。我和他交往的时候，他经常咳嗽吐血，足不出户，只是偶尔站在院子的大门里头向门外的石子路张望几眼。

那一次，我来到东厢房。天很冷，他坐在被窝里，手中捧着一本唐诗选，正抬着头，用他的宜兴山区的乡音吟诗：“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首诗，我也背诵过，是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于是我就抢着背出了后四句：“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余钟磬音。”

他很吃惊，一双小眼睛从近视镜片后打量着我，就像第一次认识我似的。过了好一会，他才问我：“你怎么会背的？”

我得意地说：“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能背的诗多着呢！”

他就问是否我父亲教的，我说都是自己偷偷看来的。于是，他就很兴奋，从被窝里爬了出来，穿好衣服，说：“‘曲径通幽处’有另一个版本，是‘竹径通幽处’，你看，用‘曲’好，还是‘竹’好呢？”

这真是一个难题，我支支吾吾的，不知从何答起。他就说他喜欢“曲”字，弯弯曲曲的，像煞了人生之路。我心中实在无法分辨哪个更好，却不愿在嘴上服输，就说喜欢“竹”字，还说，来自竹乡又特别爱竹的他也应该喜欢“竹”字。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我的意见，这一下，我们就争辩起来了。他比我大二十年呢，居然也像个孩子一样与我争得脸红耳赤的。

第二天，他遇到我父亲，就说：“这孩子，要是好好培养，必能成才！孺子可教，可教！”

以后，他就经常讲解一些诗词给我听，有时也讲一些对联和谜语。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用他老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喝墨水长大的。我最喜欢听他讲吴承恩写在《西游记》中的那首诗：“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趲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见太平？”他告诉我，这首诗的奥妙就是巧用了益智、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防己、竹沥、茴香等九味中药的名称来展示玄奘取经的经历。因为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中医知识，他讲起来，就格外地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渐渐地，这间东厢房就成了我求知的乐园，但是，在我心中，他的地位却与学校的老师不同，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朋友，因此，我也会时不时地和他开个玩笑。

那年春季的一个雨天，他教给我一个谜语，谜面是“春雨绵绵妻独宿”，谜底是“一”字。他解释说：“既是‘雨绵绵’，又何来‘春’中之‘日’？既是‘妻独宿’，又何来‘春’中之‘夫’？‘春’字去掉‘日’与‘夫’，剩下的不就是个‘一’字吗？”我拍手叫绝，但随即便指着窗台上滴滴答答的雨点儿调侃说：“这个‘雨绵绵’倒是符合今日情景的，可惜这屋子里没有‘妻’啊！”他楞了一下，紧接着，脸上就露出一丝哀怨之色，伴随着的是一阵猛烈的咳嗽，然后就吐出一口血来。我这才发觉玩笑开大了，是呀，如他现在的处境，又怎么可能娶妻成家呀？我分明是触着他的痛处了！檐外，天井中的雨正不紧不慢地下着，像永远也没有尽头似的。

我怀着凄惶的心情离开了东厢房，在经过几家人合用的堂屋时，见他的老母亲正在煤球炉上为他熬药，听得她嘴中轻轻自语：“哎，这哪里是肺病，明明就是心病嘛！”

以后的一段时间，他给我讲的几乎都是关于暮春的宋词。中国历代的文人，多的是伤春与悲秋两种情结，这大概和那些敢于为百姓发声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遭受不公有关吧？可是，我在听他讲那些伤春之词的时候，还不懂得其中的深意，只是隐隐觉得这些词中有他的清癯消瘦的身影。记得他在吟诵黄庭坚的《清平乐》时，把调子拖得很慢很慢，声音也越来越低沉：“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听这几句，就如看见那只婉转啼鸣的黄鹂鸟，在绿肥红瘦的原野上渐飞渐远，直至消失在苍茫的天地间，而落下了一个孤寂的他……

六六年的初夏，文革开始了。院门外的石子路上，不时有带着红袖章、唱着战歌、高喊着口号的红卫兵走过，斗争的浪潮铺天盖地般汹涌而来。我们的院子里每天都发生着必将让千秋万代的后人匪夷所思的故事，大多的家庭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开过栈房的、办过报馆的、收过租米的，自不待言，连正在教书的、在机关当秘书的、做小生意的也纷纷遭殃。七十多岁的房东老太太被人从她的正房赶了出来，住进了厨房后的杂物间。东院的一位在工厂做党委书记的老干部也被造反派押解到院门口来，当着众乡邻的面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嘴中还须不停地高喊：“我是走资派！”不过，这位老干部心理素质特好，晚上回家后一边抿着小酒，一边笑嘻嘻地问我们：“我白天的戏演得怎么样？”

幸运的是，在如此激烈的大风暴中，我的那位忘年交却躲过了一劫，因为长期在家养病，他单位中的造反派谁也记不起还有这样一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不然，他的身体是无论如何也经不起一击的。那时，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了，而我又无意

参加两大派之间的“文攻”或者“武卫”，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到东厢房去。但是，我已没有闲情和他谈诗词、猜谜语了，我只是把外面发生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讲给他听听，或者是把大街上散发的一些传单拿给他看看。他听了，看了，却很少讲话，只是苦涩地笑笑。

然而，有一天，他要我帮忙雇一辆三轮车，再陪着他坐车到大街上去转一圈。那是深冬的早晨，天色阴沉，霜华如水，风刮到脸上有刀割一般地痛。我们坐着一位老师傅踩的三轮，从院子前的石子路出发，穿过一条青砖小巷，就上了大街，来到市中心。作为这座城市零坐标的图书馆楼顶的大自鸣钟还高高挺立着，只是钟面的时针和分针早已停止转动了。崇安寺前那座拱北楼斑驳的墙面上悬挂着巨幅的领袖像，大街两边张贴着成千上万幅标语和大字报，无数的“打到”“横扫”“敬祝”“万岁”之类的字眼从我们的两边闪过，令人目不暇接。东方红商厦的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地响着，先是劲狂的歌声，后是某个造反派组织讨伐另一造反派组织的战斗檄文，那气势足以摧毁整座城市。突然，前面有举着红旗和大刀、长矛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过来，我们便慌忙让老师傅调转头，赶回家去。那天，他吐了好几次血，并反反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超乎想象啊！超乎想象啊！超乎……”

几天之后，他脸色凝重地问我：“将来的某一天，你大学毕业，西装革履地回到家乡，那时候，还会记得在这件小厢房里曾经有一个病得快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

我听了，哈哈地笑起来，说道：“你不知道大学都停办了吗？”

他摇摇头，连说道：“你不懂，不懂。”过了一会，他又轻轻叹了口气：“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那天，他把全版的《桃花扇》送给了我。

六八年的春节，农历正月初八的清晨，我走进东厢房，见他还睡着，就嚷嚷道：“起床了，起床了！懒虫！”我的声音很响，他却毫无反应。我伸出手，按了按他的鼻子，说：“别装了，太阳都晒屁股了！”但他还是没有反应。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仔细看去，见他脸色煞白，嘴巴在不停地呼气。我转身便跑，到堂屋去报告他的老母亲……。他再也没有醒来，后来才知道，晚上，他吃了整整一瓶的安眠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间东厢房连同整座的大院和整条的石子路都早已在拆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还是常常记起他，尤其是在国家为反右扩大化纠错的时候，我更为他激动不已。当年，他说我“不懂”的事，我也终于悟出了一些道理。只是他送

我的那本《桃花扇》找不到了，因为，这几十年的颠簸实在太多，但书中有几句曲词，却一直缠缠绵绵地萦绕于我的心头：

“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哞哞。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怀人】

史东山·潘汉年·关露

——孙谦在电影剧作所的见闻

王学礼

在1955年，风云突变。电闪雷鸣的暴雨，卷着呼啸的狂风，夹着致命的冰雹，把电影剧本创作所的许多人打得劈头盖脸，非生即死，无处躲闪。

1955年2月24日的早晨，剧本创作所的党员紧急集合，在所长室302房间开会。孙谦来到会议室的时候，只见电影局王阑西局长已经坐在了主席台上，所里的会连局长也来参加，看着个个神情凝重，一定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会上通报说：史东山自杀了，他喝了大剂量的安眠药，躺在花园饭店后楼自己的小厨房里死去了。听到这个噩耗，孙谦和大家一下子都惊呆了。

史东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导演，电影局技委会的主任，他和艺委会主任、《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蔡楚生，是电影局的两大台柱子。在当年的上海滩和电影圈里，史东山的名头之响，比之现在张艺谋，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的导演。

史东山心高气傲、个性分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他给学生上课时赞扬延安文艺界自由讨论无拘无束的风气。五十年代从上海到了北京，史东山却发表文章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应该“不止是写工农兵”，对工农兵之外的同盟军如小资产阶级，是不是也“应加以鼓励、表扬”。这样的观点，整风时被指为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唱反调。1951年他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被批为“破坏抗日干部的英雄形象”。

1955年2月初，江青带着两名持枪警卫夜访史宅，单独谈话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大家不得而知。但是之后的史东山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了。几天后，江青又突然来访。江青走后，史东山双眉紧锁，呆呆地坐在书房里。妻子华旦妮问他出了啥事，他说“她

说主席要她来关心一下电影方面的事……”沉默了好一会，他才蹦出一句话：“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在纸篓里，妻子找到一页揉成一团的信笺，上面只有一行字：“对胡风是人身攻击。”

仅一周，史东山的眼窝便深深地塌陷，史东山对妻子说，胡风等人已被内定为“反党集团”，行将在全国铺开清查运动，江青说他参与了胡风文艺小集团的活动，要他“不可执迷不悟”，马上起来揭发胡风。江青还严厉地说：“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的电影部分就是你写的，是反党反人民的，你必须反戈一击。”此前，毛泽东讲过“对二老（指蔡楚生和史东山）要客气一点”，所以江青两次找他，是要给他一个“客气”的警告。

史东山与胡风同龄，两人有过交往。20世纪30年代初，史东山在上海参加左翼电影文化运动，胡风是“左联”宣传部长，史东山担任电影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史东山与胡风交情深厚，文艺思想也与胡风有相似之处，比如两人都有表现工农兵“不止于歌颂”的观点。

1952年文艺界整风，有人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中共中央认为他坚持的错误文艺理论，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有不良影响，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胡风不服，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报告，对批判一一进行了反驳。

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一份报告，报告请求对胡风“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认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史东山作为胡风的老朋友，对江青登门对他的威胁以及要他揭发胡风的要求，十分不解，坚决不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1955年2月23日，他服食过量安眠药自杀了。史东山的遗书很快上交，华旦妮清晰地记得遗书里的一句话：“整风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刚毅如山的史东山，没有对老朋友落井下石，但又无法摆脱一而再的逼迫，以自己的生命，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做了一个注解。

在剧本创作所通报史东山自杀的会议最后，王阑西局长讲了话，他引证史东山的遗言说：“他死前写了这样的话：‘马克思固然伟大，但也应该给弗洛伊德一个小小的位置。’我们认为他的自杀是属于政治性质的。”意思就是他是属于抗拒思想改造而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最后，他以局党委的名义，要求党员对史东山的自杀情节严加保密。

就在史东山自杀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史东山，23日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52岁……”史东山的死因，消息中没有明说。

史东山在孙谦的《丰收》等多部剧本创作过程中，曾给予认真的研讨和热情的指导，并多次在创作所的剧本创作业务会议上，对孙谦剧本节奏处理等可圈可点之处给予表扬，让孙谦受益匪浅、深受鼓舞。而此时的花园饭店的大院里死一般的沉寂，经过史东山住在后楼的房前，再也看不到他伏案工作的身影了，对这位大师级同事的离世，孙谦的心里既难过又惋惜，在史东山的追思会上，他泪湿眼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之后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1955年5月第11期的《大众电影》，集中刊发了来自花园饭店批判胡风反革命罪行的文章，赵丹的《我们的愤怒已达极点》、蔡楚生《披着人皮的豺狼》、钟惦棐的《扑灭胡风蒙面党》等等，铺天盖地，剑指胡风。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查中，全国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在花园饭店一个小小的单位，也揪出了两名“胡风分子”，都是孙谦的编剧同事。一名是黄若海，解放后举家从香港投奔大陆，不久在肃反中自杀。另一名是骆宾基，也是左联时期老作家，曾做共产党地下隐蔽活动，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中关押受刑，这次却因胡风遭受牵连。

史东山自杀三个多月后6月初的一天，电影局对十三级以上的党员开了一次内部传达会，说潘汉年是隐藏在党内通敌叛变、为台湾搜集情报的内奸“反革命分子”。在参加完传达会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孙谦与不少的党员一脸的沉思与茫然，相互间默默无语。

潘汉年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统战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三十年代还是著名

的左翼作家。1955年3月21日，潘汉年赴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一些与高、饶有过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由此触发了潘汉年长期埋在心底的一件往事，那是1943年，潘汉年奉命到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与李见面后，李突然提出汪精卫现在很消沉，想见潘汉年。潘汉年明知是圈套，但权衡当时的实际情况，从大局出发，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没有马上向组织报告。

经过反复考虑，1955年4月2日，潘汉年向陈毅详细汇报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和自己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并将书面情况说明和一份检讨交给陈毅转报中央。毛泽东看过材料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紧接着6月15日，因受潘汉年案的牵连，剧本所的女作家关露被公安局逮捕，当公安干警开着警车来给她戴手铐时，她抖开一只手中握着的纱巾，盖住戴手铐的双手，神态镇定地随公安人员下楼，安详地走出了花园饭店的大门。孙谦和花园饭店的同事们，呆呆地站在院子中间，一脸的惊愕和不解，眼看着关露被塞入吉普车绝尘而去。

关露生于山西省右玉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上世纪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格朗里格浪里格朗……”这首歌的歌词就出自关露之手。对这位三十年代的才女，创作所里的人都肃然起敬。在关露面前，孙谦他们只能称得上是文学晚辈。1951年春，陈波儿提议把关露的中篇小说《苹果园》改编成电影，为此她被调入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平时，关露在花园饭店的院子里碰到孙谦抱着他的女儿时，常常和蔼地抱抱，亲亲脸蛋，摸摸小手，做个鬼脸逗逗孩子。

1939年冬，关露受中共地下党潘汉年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在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做特工，她以此做掩护，收集日伪机密情报，是一名共产党的“红色间谍”。关露曾和中共老资格外交家王炳南有过炽热的爱情，王炳南曾向周恩来坦诚请示，周恩来沉思片刻说：“关露有‘汉奸’的名声，你在外交界工作，恐怕多有不利。”之后，两人便忍痛割爱地分手了。

关露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二年，1957年3月26日出狱时，公安部内部的一份对关露问题审查报告中，竟然说“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公开地为敌

人工作。”把地下党特工应有的本职工作，荒唐地定为关露的一条罪状。出狱不久，她接到了电影局劝她退休的通知，理由是这么多年她没有写出电影剧本来。后来，她的组织人事关系被强行转到了北京香山街道农业大队。文革开始后，她第二次被捕，又坐了八年监狱。两次蹲监狱，在单人囚室里，被人拳打脚踢，受尽了折磨。在1982年3月23日中组部为她正式平反后的12月5日，关露在写完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了。

关露的悲惨结局，让作为同事的孙谦悯怀不已。1977年，山西省派下一个创作任务，让写一个煤矿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由孙谦领衔主笔，年轻作家周宗奇来打下手。为此孙谦和周宗奇到煤矿体验生活，在矿区他们采访了42岁的计划科长苏景云。

苏景云是位知识女性，抚顺煤校毕业，是阳泉矿务局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采煤队长，在井下指挥着一百多个男人们干活儿。采访完苏景云，孙谦叹了一口气，冒出一句在旁人看来纯粹不着边际的话：“都是好女人，可这命运不大一样啊！”孙谦触今生情，给周宗奇讲了一个故事。周宗奇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追问一句：孙老师您这说谁呢？

他停了一会，说：来，我给你讲一个人。于是孙老师讲出一段动人故事：

关露是孙老师在中央电影局时的女同事，中等个头儿，小鼻子小眼儿，年轻时比较漂亮。30年代在上海读书，是地下党员。抗战开始前夕，她接受党组织指示留在上海，由潘汉年领导。上海沦陷后，她听从上级决定，公开投敌，发表诗歌文章吹捧“大东亚共荣”，争取日本侵略者的信任。但日方对她还是不放心，派一个日本男人给她做秘书，实际上是监视她的特务。此人相貌堂堂，也懂得文学。两人相处日久，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遂同居。

关露一时挺红，在全国各大战区周游，又去日本访问（实际上是党组织派她去的，要给日共送一封信），引起民愤极大。有次去整容，不明真相的爱国医务人员故意让手术失败，给她鼻眼间留下一处永久性的伤疤。抗日战争胜利，蒋军接管上海，通缉汉奸关露。她请示党组织后逃离上海，回到解放区。

不久受潘汉年案的牵连被捕入狱，一关两年。以后随着政治风云变幻，又坐了快十年的监狱。出来时已然进入老年。一生无丈夫，无子女，无亲无友，无家可归，要说还曾过过一点家庭生活，享过一点天伦之乐，就是与那个日本男人同居时期。退休

后，在香山脚下租一农舍，里头到处摆放着用补发工资买来的各色香水，日夕把玩，孤寂中打发着自己的风烛残年。

听完这个故事，我说此人白活一生。孙老师半天才说，总算给革命作过贡献。

关露冒死为党的事业隐名埋姓，忍辱负重，一生奉献无果，最后含冤自杀殉道，她的悲惨命运，孙谦每每念及，总是无法释怀，不尽地感伤。

苏景云与关露，一个是煤矿采掘面的“地下”挖煤人，一个是打入敌伪内部的“地下”共产党，暗处工作的性质极度地相似，苏景云“面目端庄秀丽，温柔动人，笑起来更好看”的外形，办事果敢利落的内质，关露竟也与之高度神合，怎能不让人由此及彼？孙谦发出了“都是好女人，可这命运不大一样啊”的悲悯，道出了“此人白活一生，总算给革命作过贡献”的感慨，这份念念不忘的情感，一直埋藏在他的心里。

给周宗奇讲完故事的当晚，孙谦喝了双份安眠药，他思绪万千、难以入睡。也正是孙谦这次关露传奇的讲述，成为了几十年后周宗奇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三个红色殉道者》的最初牵引。■

【述往】

染血的回忆(下)

——人大两派群众组织割据武斗的11个月

(1967·9—1968·7)

李豫生

第二阶段 从备战加剧到激战终结 自68年3月27日打倒“杨、余、傅”起，至8月22日第三批军宣队进校，群众组织自行消亡止。

1968年3月27日始，随着中央文革发布的新的动员令，两派群众组织向新暴露的敌人——“杨余傅反党集团”发起新一轮冲锋，而这新一轮冲锋的对象就是校内对立派，把对立派打成“杨余付”的小爬虫，才能彰显出自身再立新功的忠诚。

震源裂变，震波涌动。已被割裂肢解的人大校园，气氛再次凝重。

“‘三·二七’大会以后，人大公社的武斗准备逐渐达到了高潮。据人大公社武斗队

黑头目李德山供认，在三月底，他们就非法盗用修建科仓库大量钢材，打制长矛一千多支、匕首四、五百把。四月份又拆掉校园四周的铁栏杆作钩镰枪。并非法砍伐大量树木；出动大卡车装运砖石；动用公款 17 万元购置武斗用具。四月二十七日晚八时许，他们竟然在交通股一带试验了炸药包、毒气弹。”

人大三红 1968 年 5 月 22 日第 61 期 第三版文章“是谁打响了第一枪？”如是说。

对此，新人大在 1968 年 6 月《新人大》报第 67 期 第三版文章“究竟是誰打响了武斗第一枪？”中反驳：

“五月十日，他们在得到解放军宣传队即将离校集中学习的消息不到两小时，就用法西斯手段非法绑架贫农出身，曾经参加过八路军的我新人大革命工人李德山同志，从而打响了武斗第一枪。这是他们继四月二十五日公开对抗解放军制止武斗的广播讲话、四月二十八日非法抢走幼儿园儿童口粮 13656 斤和四月二十九日非法抢占办公大楼之后，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他们从三月下旬以来，在他们的黑后台扬余付揪出来以后，就长期策划的大观模武斗，终于在他們一手挑动之下爆发了！”

两相对照，凸显出事态变化的两个节点：“三·二七”之后的备战升温和“五·一〇”之后的战幕重开。两节点背后隐现的问题是：是时军宣队在哪里？此刻的卫戍区军宣队为何缺位？

上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双方尚能在卫戍区的主持下，签订制止武斗协议。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卫戍区付司令员李钟奇还来校做过视察，检查协议的落实执行。1968 年 2 月 16 日《新人大》报为当日第二批军宣队进校而出特刊。文中追记了两个多月前第一批军宣队进校后“支左不支派”的工作：广泛深入调查研究、耐心细致思想工作、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革命大联合。

三月，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突变“新反党集团”成员，卫戍区下派各校军宣队应当只能是原地停摆，不知何所。于是，校内仅存的一点居中调和力都告失效，两派故态复萌，新一轮的“抓黑手”角逐再起。直至五月十日第二批军宣队离校集中学习，权力位置彻底真空，三红迅疾抓走新人大方面武斗队的主力工人李德山，双方夺人大战，互指对方“打响了武斗第一枪”。

自此，启开其后的“五·一一”、“五·一二”、“五·一四”、“五·一七”、“五·二二”……恶斗连续升级、不可遏制，终至将一派同学打死五人！

1968 年 6 月《新人大》报第 67 期 第三版 “究竟是誰打响了武斗第一枪？”文载：

“五月十一日下午一点,他们派出大批法西斯暴徒,非法抢占、洗劫了教工家属宿舍,并非法强占东大门,下午三点,他们又公然派出数百名全付武装的暴徒,公开抢走我社在五处的广播喇叭,大打出手!接着他们又非法强占并肆意毁坏电话总机,抢劫收发室,非法绑架和残酷毒打我新人大战士,甚至惨无人道地施以电刑,进行逼供信。崔老妖和法西斯反动臭老保人大三红总部,就是这样得寸进尺,打响了武斗的第二枪。

五月十四日凌晨二时半,他们大开杀戒,公然派出数百名武装到牙齿的暴徒,抢劫和破坏校工厂国家财产,偷袭和杀伤我新人大工厂大队护厂战士,并且狠下毒手,残酷地用长矛刺死前去保卫国家财产、抢救阶级兄弟的我新人大优秀战士王锡中同志,又一次挑起了大规模武斗,打响了武斗的第三枪。

五月十七日中午,他们又抢劫并捣毁了我校体育用品仓库,打响了武斗的第四枪。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我新人大战士为了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新人大战士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在北楼一带修筑自卫工事。法西斯反动臭老保人大三红总部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动了数百名全付武装的武斗专业队,分别以数十人一队,从他们的总部白楼、留学生楼、南楼、六处等地,集中接近到我修筑自卫工事一带埋伏。他们的坏头头刘庆库亲临现场,进行策划。当他们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拉响警报器作为进攻的信号,在反革命杀人犯李德山的直接指挥下,主动向我修筑工事的新人大战士发起冲锋,打响了武斗第五枪。

在他们挑起的武斗中,反革命杀人犯李德三(山),魏玉(雨)庆等亡命之徒,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人大三红》第71期 《新人大报》红3号1968年8月4日合刊第三版“反革命武斗狂的罪恶史” 文载:

“从“3.27”至四月中旬,赵桂林之流进行武斗挑衅,据不完全统计,达十四次之多。他们非法绑架、残酷殴打许耀钧、高承宗等三红战士多人,甚至赵桂林还亲自率领数十名武斗打手,冲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严重打伤我三红女战士姜化英等三人。

.....

四月二十五日晚,他们强占了我三红档案兵团和研究所兵团办公室;

四月二十六日,他们大规模抢修总部大楼武斗工事,在交通股开办武斗食堂;

四月二十七日晚，他们在交通股试验炸药包，在此前后，他们多次派人外出盗买军火、炸药；

四月二十八日，他们非法绑架、毒打我三红战士黄茂祥。拆掉校工厂铁栏杆，赶制杀人凶器；

五月六日晚，他们突然袭击六处六排我三红战士宿舍，打伤三红战士二名。

……

五月十日晚，他们就借口我人大三红揪出反革命分子、一贯打人行凶的坏蛋、人大公社战斗专业队头目李德山，悍然调动大批武装暴徒强占林园小楼，绑架和毒打三红战士孙占升，将长期卧床养病的三红女战士王纪霆的双腿活活打断，洗劫我十一名三红战士宿舍，许多家属、小孩也惨遭毒打，从而一手挑起了从五月十日开始的全校性大规模武斗。

五月十一日，赵桂林之流又倾巢出动，强占家属住宅林园1—9楼、一处：、二处、四处、北五楼、医务所、幼儿园、图书馆、校工厂以及职工食堂。他们疯狂破坏国家财产，毁坏房屋，大肆抢劫职工财物，绑架、毒打我三红战士陈沅等同志，连老人、小孩、孕妇也不能幸免。他们甚至大耍流氓，将附中女学生××按倒在地、企图强奸。真是奸奸淫掠夺，无恶不作。同日下午，他们又出动全副武装的暴徒一百多名突然袭击南五楼和六处学生宿舍，打伤我三红战士二十多名，其中重伤五人。

……

五月十二日，赵桂林之流将校工厂我三红战士全部用武力逐出厂外，破坏了校工厂抓革命、促生产的正常进行，肆无忌惮地赶制杀人凶器。为了制止赵桂林之流的罪恶行径，我人大三红“横扫千军”战斗队于五月十四日凌晨采取革命行动，取缔了人大公社这个制造杀人武器的地下兵工厂。赵桂林之流出动大批武斗专业队员，手执长矛大刀向我三红战士猛扑过来，使我战士多人负伤，一手制造了“五·一四”反革命血案。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赵桂林之流趁我20余名三红战士在我方住区内修筑自卫工事之机，集合200余名全副武装的暴徒，配备了摄影记者、啦啦队、担架队、医疗队，分三路猛扑过来，妄图一举将我20余名三红战士置于死地。我三红战士由于事先毫无戒备，当场有数人受伤，被这伙暴徒逼到了一个大深坑前，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不得不奋起自卫，结果造成双方数十人伤亡。十分清楚，“五·二二”大规模流血事

件，完全是赵桂林这流事先精心策划的，他们不仅是杀害我三红战士的凶手，而且是杀害人大公社战士的罪魁！

……

……焦头烂额、穷途末路的反革命黑党委及其走狗赵桂林之流竟敢冒天下之大不为，于七月二日凌晨悍然向我三红和新人大革造站住区连投十余颗手榴弹，并用步枪、土炮连读射击，当场打伤我战士多人，这样，赵桂林之流就在人民大学开创了使用军火器的恶劣先例。直到中央‘七·三’布告发表以后，他们还几乎每天都向我三红和新人大革造站住区放枪开炮，几乎每夜都在试验高级的杀人武器，严重地威胁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破坏了首都革命秩序。”

一九六八年的六、七月间，北京各高校校园尽成武斗战场，各校两派相互杀砍，所用武器上升到真枪实弹。道路上常有满载头戴柳条帽、手持铁矛枪“战士”的卡车疾驰而过，那是到其他院校驰援。

七月二十八日夜，最高领袖亲自派遣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攻入清华大学，终结了这场荒唐的北京高校大武斗。

八月二日人民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入校，两派头头集中办学习班，学生、教师各回各系，群众组织自然消亡。

据披露，1966年12月26日大领袖73岁生日时，他和江青请了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一干人吃饭，席间曾举杯祝酒：“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他对于“全面内战”是合于心意、乐观其成的。

最高领袖的理想程序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而必须实施“天下大乱”的基本前提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最终的结果必须是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消灭。“走资派”彻底消灭之时，便是“天下大治”实现之日。在这个预设前提下，各个革命的群众组织无不争先恐后。为彰显自身的革命彻底性竭尽所能的将对立面打成“反动臭老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此恶斗，何能达到“天下大治”，只会招致“天下更乱”。

在无可收拾的情况下，最高领袖只有实行他的绝对权威“武力清场”，于是有了7.27工人宣传队的进驻清华园。最高领袖最终抛弃了他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心爱的造反派，造反派烟消云散却并未寿终正寝。尔后，在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等各种名义之下，

紧跟伟大领袖，不惜以千百万被打倒的走资派、政治贱民的鲜血和生命为铺路石一路践踏过去的造反派，最终使自己双手沾血、成为被整肃的对象。指使者与冲锋者的“蜜月”结束了，这就是所说的“某用了造反派两年，整了造反派八年”。

文化大革命中由北京在校的老五届大学生中产生的高校红卫兵组织及代表他们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例外），曾经是伟大领袖的爱将、干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教育的同龄人，因为按照正常学龄，他们是在建国以后，1949年至1953年期间入小学读书的，即受过完整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教育。这中间哪些是“封资修”教育，哪些是“红色教育”，权另作分析。明确的是，在他们中间绝不缺乏“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士。问题在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他们的热血被放在了谁的祭坛？

【述往】

艰难岁月

——我的中学生活（1958--1961）

李耿立

抗日英雄李墨林

老师告诉我们，一位抗日英雄要来给我们做报告。我们都眼巴巴的盼着。星期天，我们在马嘎啦庙的院子里集合了，倒班上课的同学们也来了。北房台阶下摆好了一张桌子。铺上了白桌布，还放了一盆花。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李墨林来了。他当时是四季青公社的社长。他中等偏上的个子，身躯壮硕，红脸膛，短平头，两道浓眉，眼睛特亮。他是个大嗓门，说话带着膛音。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都是洋学生，是国家有用的人。我是个种菜的，我种的是最好的菜。为什么说是最好的呢？俗话说：“白菜不如白菜，百面不如白面”，我们种的最多的就是大白菜，千家万户离不了。干什么都是光荣的，种好菜就是我们的光荣。

风趣的开头一下子吸引了大家。那句俗语成了我们后来老念叨的话。他是保定那一带的人，那是个出豪杰的地方。他家里穷，小时候没上过学。日本打进来，他就参加了武工队，在京南一带活动。他是个孤胆英雄，常常腰揣两把盒子枪，到敌人占住

的地方锄奸，他一进镇，汉奸们都吓得藏起来，说李阎王来了。解放了，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开会领导讲话也记不全，只能当个公社社长，而他手下的都升官了。

所以，他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学得好当大官坐小汽车，学得不好只能坐大汽车。校长一看，报告跑调了，一时不知如何收场，赶紧递上茶水，老师也领着我们喊口号，向老英雄致敬，向老英雄学习！

他还想再讲，校长赶紧打断话头，开始总结。把他弄下台来。我当时想，老英雄觉悟不算高呀，应当想着全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怎么想当官呢想坐小轿车呢？原来英雄也是凡人，也有落后思想。老英雄走后，校长又讲话，叫我们吸收正面的东西，说太阳里也有黑子等等。

挨饿年代

1960-1962 我们国家经受了灾荒。其实从 59 年就可以看见端倪了。那几年华北地区没有天灾，59 年还是大丰收。大白菜又大又瓷实，白薯长得把地都挣出了缝，用脚一扒拉就踢出一大块头。但那年农村开始吃大食堂，“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敞开肚子吃大米白面，我同学家是农业户，他爸从大队食堂打一盆子小米饭，不小心扣地下了，收也不收，再去打一盆。那么好的白薯没有人收，都烂在地里了。再大的家业也经不住折腾，很快大食堂吃不起了，没粮了。

我妈所在的研究所的南边全是麦子地。当时推广密植，要放卫星。转过春来麦子返青后，苗长得密不透风，就是不出穗。农民们隔一行拔一行，一边拔一边骂大街。骂干部“拉出的屎往回坐”，是“倒骚”（北京土话，大约是来回折腾）。

到了 60 年，错误政策的恶果开始显现，饥饿像乌云压城一般笼罩了祖国大地。居住北京的人们算是幸运的，粮食定量削减了，副食和蔬菜都跟着减了，但比全国其他地方好得多。每家都买了秤，做饭每顿都得称量。学校里体育课停了，减少热量损失。老师们在操场上种起了庄稼。人们开始寻找一切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大伙跑到收过白薯、土豆的地里刨找，找落在地里的根子、须子，那叫做“遛土豆”“遛白薯”，城里的人也下来拿着炉钩子，饭铲子之类“遛”，地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头一遍是农民们溜，他们刨白薯时故意不刨干净，可以刨到大块的；我们刨第二遍，根子、小须留块的还能见到；等城里人知道了来刨第三茬，基本上是什么也没了。

失望的人们把目标转向了树和野菜。首先是榆树的榆钱，榆树叶子，接着是榆皮

面（剥下榆树皮，砸烂泡水沉淀，得到一种红色的面，很劲道好吃）。榆树剥死了，开始找苋菜、灰菜、扫帚苗、马齿苋等野菜，掺一点棒子面蒸了吃。也很好吃，先还掐嫩尖，后来连老叶子也不放过。这些都没了，我们试验过杨树叶和柳树叶，去掉黄叶，叶柄，嫩叶子煮了，掺点面蒸“苦累”，也还可以下咽。杨树叶子好吃一些，柳树叶子很苦。低处的叶子没有了，高处的又很难够到。我姥姥决定试试麦苗，因为麦子春天返青，冬天羊吃了苗，春天又会会长出来，拔走一些不会影响它生长，不会有人管。但麦苗实在是不能吃，无论是蒸还是煮，它始终是粗纤维，嚼着它，就如同嚼麻绳子，咽不下去。连咽下的水也没一点好味，人毕竟没有羊的消化器官，试验失败了。

全国人们都在试，什么膨化食品（又叫粮食倍增器）、什么小球藻（又叫人造肉）。奇怪的是，随着粮食没了，菜也没了，原来在四季青公社到处可见的大白菜都没了，要拿着副食购货本去副食店买，一人一周二两半白菜（基本就是一个菜帮子的分量），排半天队，你只买回几个白菜帮子，那是一家子一周的量。我和弟弟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姥姥把她那份口粮省出来让我们吃，不久她浮肿了，腿肿得老粗，和她原来的小脚都分不出个了，按一下一个大坑。后来脸也有些肿了。妈妈带她去医务所看，大夫给开了二两黄豆，这是不用粮票的。姥姥把黄豆炒了，用擀面杖压成碎面，装在小瓶里，一天吃一小勺，现在看就是补充蛋白。

为了充饥，人们发明了一种汤。叫做“兑汤”：一大勺酱油，一点盐和一点醋，兑上开水，喝下去马上有饱的感觉。如果有葱花、香菜末、虾皮、紫菜任意一种，再点上一两滴香油，那就是贵族级兑汤。当然，那是坚持不了一小会的。早上一般是一大碗兑汤，不吃其他东西，早上那份挪到中午一块吃。到食堂、饭馆吃饭的人们都会护着饭碗，眼睛余光扫视四周，防备有饿急的人来撒一把土或吐口吐沫，你嫌脏不吃了，他就拿去狼吞虎咽。吃完了的饭碗各个被舔得干干净净，掉到地下的饭粒，窝头渣都会捡起来，没有蚂蚁的份。直到现在，掉到地下的馒头渣我还会下意识地捡起来丢到嘴里。反正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不会浪费粮食的，算是时代的烙印吧。

那时人们整天琢磨的就是怎么减少热量消耗，到哪里能整到填肚子的东西，可越想就越觉得饿。碰到一块说话，说着说着就会讲到吃饭，有人就会讲到当年在哪里胡吃海喝，几盘几碗，让人觉得更饿。其他东西也跟着涨价了，听说农村集上兔子卖到了20元钱一只，烟叶子卖到10元一斤，烟瘾熬不住又没钱的，可以一毛钱抽一口烟卷。花一毛钱，把气吐尽，尽力一吸，气足的可以抽掉多半根烟。一块钱可以买3斤

萝卜。买萝卜的农民说，我拎两个大萝卜就能逛趟北京城，连理发带洗澡还有富余。可不是吗？理个发一毛钱，洗个澡，用澡堂子的手巾肥皂带搓澡才两毛六分钱，汽车费一毛五就够。那时乡下有亲戚是人人羡慕的。抗过了三年灾害的人，绝对吃嘛嘛香。文革期间我在大学，搞不忘阶级苦的教育，吃忆苦饭，大个糠团子我一口气吃了四个，一点也没觉得苦。

父亲从北大荒调到了农垦部

父亲在我幼年的印象里是十分模糊的，因为他一直在外面工作，极少回家。后来听他讲过，他十五岁时我爷爷去世，他独自在北京四中上学，19岁和母亲结婚，20岁时有了我。1949年父亲考入华北革命大学，算是参加了革命，后来又考入了外国语学院，成了新中国第一届学生，当时的录取通知，是登在人民日报的，我姑姑还保存着那张报纸的复印件（因为我姑父也被录取）。那时我母亲也在北京，但我太小，没有记住什么事。1950年，母亲到察哈尔省盐务局参加工作，到了张家口，他们开始分居。1953年，父亲毕业，他选择了参加志愿军到朝鲜而不是留校。他在中朝苏联合空军大队做侦听翻译。不久朝鲜战争停战，他转入北京空司，到山东荣成工作，后来又调到南京空司，在福州鼓山继续做侦听工作。而母亲调干到太原机械学院上学，1954年毕业分到北京冷泉的研究所，我们全家跟着母亲搬到北京。1958年大裁军，十万官兵下北大荒转为农垦，我爸又积极报名，从福州直接到了北大荒，而没有回家，记得他在天津换车，母亲是到天津和父亲见了一面。那时候的人们都充满革命豪情和使命感，把自己当成螺丝钉，党的驯服工具，以革命的需要当第一，没有个人的意愿。我父母那时都是三十岁左右的热血青年，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每年只有几天探亲假是团聚的日子。父亲分到北大荒密山、虎林一带的858农场，当农垦战士种地，还在乌苏里江边打过鱼，后来是食堂管理员。

小时候只记得他总是寄回儿童读物，少年文艺等书籍，探亲时带回很多好吃的。我写去的信很短，有时只是在妈妈的信上附上几句，他回信总是很长，连我写的错字也一一订正。大一点了从他的来信里约略的知道一些情况：比如每人要种250亩地，秋收时机器、牲口、人一起上阵，几天几夜不休息，和老天争粮。夏天时，那里变成大沼泽，人马都出不来，隔绝在那里，天天吃黄豆。我还记得我和妈妈买了好多大块的碱（约一尺见方，三寸厚的大块），缝到布袋里给当食堂管理员的爸爸寄去，因为

那里买不到碱，只能吃酸馒头。

到1960年情况有了变化。王震去858农场视察，见到我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在干着完全不需要文化的活儿，勃然大怒，指着那里的官们说，你们这是浪费人才，马上给我调走，我要他们。他在哪儿坐镇，包括我父亲在内的40多人调回了北京。父亲到了农垦部外事处。可是，等王震一走，调动的事马上停了，许多人才又被继续浪费。

当然这些变化我不知道，估计连我妈妈也不知道。那时一封书信到北大荒怎么也得半个月。一天上午，我正在上课，老师把我叫到教研室告诉我，你不用上课了，你爸爸回来了！下课后同学们都知道了这事，好朋友曹随咬着耳朵对我说，一会你见了爸爸，一定会扑上去，抱着他，激动地流泪大喊。

我一出教学楼，就看到校门口阳光下站着一个人。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意识到那就是父亲，往那里走过去。父亲也慢慢往我这里走过来，走到十来米的地方，我们都站住了，相互打量着，他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一个瘦瘦的老头，胡子拉碴的，带了个皮帽子，穿了一件油脂麻花的绿军大衣，脖领子那儿是一条子黑黑的油腻。却是满脸的笑容。看我不动，他叫我的小名：立立，回家吧！我说：嗯！就跟着他一前一后地往家走，没有拥抱，没有叫喊，没有激动。我知道：他一定是刚到家就迫不及待的来叫我的。我没有扑上去抱着他，他或许有些失落。但太生疏了，或者是因为小男子汉的矜持，我做不出那些。想写篇文章记载这次见面的曹随一定也失望了。

尽管没在脸上表现出来，心里却是激流滚滚，浑身发热：我爸爸回来了！仿佛有了主心骨。全家都沉浸在欢乐中，尽管粮票紧张，细粮很少，也要吃顿饺子。姥姥、妈妈和爸爸一起动手拆洗我爸带回来的被褥衣服。北大荒那时非常冷，冬天几天不洗脸，几个月不能洗澡是常有的事，经常在地里摸爬滚打，脏，油腻、长虱子是必然的。但再脏也不能扔掉，因为全家一年的布票也不够做一套铺盖的。那一阵，我家和邻居家门口的晾衣绳上成天挂满布片、衣服，在冬天的阳光下先冻后干。上午学校上主课，下午就是体育和副课，音乐美术之类，那几天老师特准我下午不上课，在家里陪父亲。父亲详尽地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我还跟他一起到我小学上学的蓝靛厂逛了一次。在蓝靛厂丁字街一家叫做“三路居”的小饭馆吃了饭。父亲要了几个菜，他自己并没怎么吃，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和弟弟吃完。

绿面包和活鱼食堂

61年春天饥荒更严重了，树叶和野菜都没长出来，溜过多少遍的地里连个白薯须须也不会找得到。副食品越来越少了，买糖酒烟茶之类全凭各种票，豆腐、粉条之类春节才有。每家都有个副食本，蔬菜也要凭本供应，数量是不确定的，每次副食店会挂出小黑板写出本周的供应量。记得一次一个人供二两半白菜，排了半天队，只买回几个白菜帮。

有一天父亲回来的比平日晚得多，满脸笑容，夹了一个大包。揭开一层层的报纸，里面露出个长方形的东西，像是个大枕头，足有一尺多长，颜色看不出是灰还是绿。原来这是农垦部下属的农场研制的玉米棒面包，是用玉米棒的芯芯、玉米秸和叶子充分磨细后制作的。农场试制成功后到农垦部报喜送的样品。农垦部的职员都分到了一个。这正是雪中送炭，马上切下一片全家都尝尝。没有粮食的香味，但也没有怪味，有点刺嗓子，但绝对咽得下去，长久空虚的肠胃感觉就更好了。那个绿面包是个救命的宝贝，我们吃了一周多。

我那年十三岁，弟弟十一岁，都在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都饿，周围的人们天天琢磨着吃，越琢磨就越觉得饿。也影响着我们的感觉。我的一根根肋骨隔着背心都看得出来，弟弟的圆脸也变成了长脸。那天父亲宣布，我们全家去吃一次“活鱼食堂”。活鱼食堂在紫竹院公园里，靠近南门的地方。当时那可是远近闻名的。食堂门外有个圆形水池，里面养着很多大鱼。如果出20块钱，一家就可以不用粮票足吃一顿，一个主菜就是从池子里现捞的活鱼。出15块钱，也可以足吃一顿，但没有鱼，菜也差一些。20块钱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差不多是父亲半个月工资。父亲和母亲商量了多次决定的。当然去吃活鱼食堂的前一天，我们就不吃饭了，留着肚子去吃那一顿。那顿饭多么好吃没法形容。现在的人饿上一个星期再去吃没准能体会得到。

粮食出口古巴

一天报纸上登出了一条消息，我们援助了古巴一万吨大米。我们都觉得很对。我们要站在新中国，放眼全世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古巴站在抗美援朝的最前线，我们当然要支援他。我们那时学了一首歌，叫做“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只记得最后两句：古巴西，扬基诺，古巴西，扬基诺！

但慢慢就有了一些流言，我们自己都没得吃，干嘛给别人？同学们之间也有这么

说的。学校老师开始做政治工作。那时我们正讲公制和市制单位的区别，老师拿出一架天平，一头放上一克的砝码，另一头往上放大米粒。量了几次，让三个同学数米粒数，然后平均。57粒米重一克。老师说：按一克米六十粒，大家算一算。一万吨多少粒米？大家开始算：一公斤六万粒，一吨六千万粒。一万吨六千亿粒。老师说中国六亿人，每人核到六千粒米。一年365天，每天只要省出18粒米就够给古巴的了。你们连18粒米也省不出来吗？少掉几个米粒就行了。大家一起喊，省的出来！

于是又开唱“古巴西，扬基诺！那时的政治工作多么到位呀！学了知识又化解了怨气。

“顺”东西

因为饥荒迁延的时间不短了，同学们的家庭都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什么门路，多数也没有农村的亲戚。所以大家最常说到的话题不是功课，而是哪儿能弄到吃的？不知何时，一些同学间流行起练习偷东西（叫做“顺”东西）的游戏，课间时凑在一起，或挤你一下，或拍你一把，在你转移注意力时，从你身上顺走一件东西，然后迅速的转移到别人那里，或自己藏起来。

有一次我的钢笔被一个擦肩而过的同学顺走了，我当时就觉察了，不过一两分钟。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他从大衣下摆那掏出来了，原来他在大衣口袋里弄了个洞，钢笔从洞里掉到下摆那儿。

也练习两个手指从口袋里夹钱包，或在手指缝里夹半片刮胡刀片搨口袋。这样的练习并不真的要偷你的东西，偷了会还你，或者告诉你让你找。完事一笑而已，并不避讳大家。

后来这几个人就开始真的干了。工体路上有六路公共汽车（那时缺汽油，车厢顶上都背着一个老大的橡胶汽包，里面灌着煤气作动力源），上下班时坐车的人很多，几个同学就在那路车上“干活”。后来听一个同学带着羡慕的口气总结他们的经验：在人们往车上挤的时候，他们跟在后面连叫带挤，互相掩护，那时下手，并不上车。偷了钱包，立刻掏走钱和粮票，钱包多半扔在下水道口，证件留下。

我去车站附近的下水道口看过，里面真有不少钱包。他们几个得手之后，结伙到饭馆饱餐一顿，往往会带回一饭盒肉菜，分给班里的同学们吃。像我这样的好学生，班干部、女同学不给。其他人都能享受到。或许是他们的道义，或许是一种贿赂。总

之，没有人去告发他们，他们有群众基础。

天线和敌台

即使在那样的氛围里，老师们还是督促我们学知识，努力开拓我们的视野，成立了课外小组。我参加的小组是学装矿石收音机。矿石其实是黄铁矿的晶体，颜色金黄，一般是个四面正方的晶体，装在一个玻璃管里。玻璃管一头有根细细的金属丝，搭在矿石上。玻璃管两头有接线柱，好像也不用电池，接上天线和耳机就能听到电台的广播。黄铁矿石有方向性，你得调节那根细金属丝，戴着耳机仔细听，反复比较，就可以找到最佳的一点，搭在那一点声音会大一点。父亲很支持我，给我买齐了所有东西。

我装了一台，把它固定在木板上。一回家就调它。居然有了声音，不过只有一个电台，时断时续，老得调那根细丝。后来在一本叫做《家庭实验》的书上看到，要想收听效果好，天线是关键。我决定按照书上的图样做个天线。我找了一根长竹竿子，头上绑一根横棍儿，成十字架形，十字架上钉上小钉子隔开距离，让爸爸买了几米多股铜线，在十字架上绕成菱形的网。正巧我们的房子和围墙之间的夹道里有一棵很高的臭椿树，我把天线架到树上，准备好好调调矿石机。

不料刚架上两天，派出所的警察就找到家里来了，他们来调查天线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要收听敌台？敌台当时是指所有外国的广播电台，台湾、港澳的广播电台。那时所有的收音机都是没有短波的，根本收不到敌台。何况我们家还没有收音机，否则会很麻烦。我把矿石机让他们看，他们始终半信半疑。过了一天，他们又来了，叫我把天线撤掉。晚上父母亲下班回来一商量，赶紧把天线弄下来了。从此再没有兴趣弄什么矿石机了。

东直门开荒地、膏药和买萝卜

那时东直门的城墙还没拆，城墙外还有护城河，不过河里没有多少水。我们住的东羊管胡同离城墙也就是200米。城墙根一带没有人家。因为粮食紧张，人人都得想辙找到填肚子的东西。姥爷说咱们开点荒地吧！他已经看了多次了，看好了护城河外边一块地，离大路较远，没多少人去。一天他带着我和弟弟，拿着一把镐，一把铁锨去刨地。护城河的地不算好，是硬硬的黄土疙瘩，还掺有不少的小石头。一镐下去只

能刨进一两寸深。弟弟一会儿就不干了，我是主力，咬着牙一直干。手上起了泡也不停。第二天又接着去刨，终于刨出了一块有20来米长。3米来宽的地。捡走地里的石子，码到地边上做成边界，靠近道路的一边埋上酸枣树枝子。那地还真有模有样了。我们祖孙三个坐在地边，一边喝水休息看风景一边商量着种点什么。

北京的秋天天高云淡，傍晚的阳光把城墙勾出了金边。只见一只喜鹊叼着个虫子飞过，它后边一只黑乌鸦俯冲下来，用一只翅膀猛地敲了它的脊背。大概是感觉疼了，它吐出了虫子，喳喳地直叫。那只乌鸦急扇了几下翅膀，超过喜鹊，抄起半空的虫子就飞走了。我气得捡起一块石头扔向乌鸦，没有打到。好心情被这恃强凌弱。抢他人口粮的家伙破坏了。

那块地我们种了麦子。从护城河里提了水来浇，姥爷还到东直门外去捡了些马粪做肥料，我和弟弟搂了烂树叶，增加腐殖质。终因地太差了，只收了多半面口袋麦粒。547厂（和平里）俱乐部后边那时是个村子，村里有个碾子。我们把麦子碾了，没有找到细罗，筛出的面很粗，麦皮也没出净。第一次用那面试蒸馒头，大伙眼睛都紧张地盯着锅。一掀盖，颜色黑黑的，面没发得起来，皮上疙疙瘩瘩不光溜，还看得出没压好的麦子粒。别看样子难看，一吃还真香。

后来我们再做时，就掺点好面，蒸成窝头。姥爷在547厂当临时工看锅炉房。他就带着我们自制的窝头上班。锅炉房还有个临时工小伙子，外号叫“傻子”。他觉得的食堂里的馒头“喧”，不抗饿，我姥爷发的不好的“窝头”沉甸甸的，实在，非要和我姥爷换着吃。姥爷有时就多带几个给他。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傻子”有时也到家里来，他有风湿病，姥爷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方子，熬膏药给他，据他说挺有效。渐渐地后来好多人都来要，姥爷熬了不少回。那方子只有一味药叫做藤黄。是画国画用的颜料，也是中药，略有小毒。都是我去药店买。藤黄是圆圆的柱状，像一截甘蔗。外表灰糊糊的，心里是黄的。砸碎成小丁快，铁锅里放山西老醋，倒入藤黄块，小火开熬，不断搅拌，最后成膏时，就变成黑色了。趁热倒在白布上，呆会儿一对折就成了。贴的时候稍微一热就可以。

那时人们不认什么高蛋白、高热量，老想找到有体积的东西填满胃的空间，白薯是要粮票的，五斤白薯顶一斤粮食。剩下的萝卜就是首选了。萝卜后来买到了一块钱两三个，离城远的地方价格低。我和表哥邢泽华被派去买萝卜，我们决定去顺义那边找。顺义离东直门60里，我们一大早骑自行车出发，骑到中午，觉得够远了，见到路

边有卖的就问问价。终于问到肯一块钱三个的了。我们买了17块钱的，应当51个萝卜。装到麻袋里兴冲冲地往回走，快到家时，饿的骑不动了，想分一个萝卜吃，垫吧垫吧。一数，怎么只有50个。肯定是趁我们高兴时那家伙少给了。两个大小伙子，平日自以为数学学得不错，居然没数清数！太丢人了！商量一下，萝卜不能吃了，回去就说我们吃了一个，好对上钱数。那时的17块钱绝对是个大数目呀。■

【读书与读片】

《王蒙自传》浅议

——言之有文，行之不远

方延曦

我看了《王蒙自传》，特别感兴趣的内容有三，一是他被打成右派的真正原因，一是他在新疆的生活，一是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对第一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王蒙在被打成右派之前，他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毛称赞过“有才气”；后来，毛还曾对他说过一些保护性的话，而王为什么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厄运？

对第二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虽然知道王蒙被打成右派后去了新疆，但对他在新疆的生活详情始终不清楚。听说那个外号“王胡子”的上将王震尽管左得惊人，却对一些右派分子庇护有加，不知王蒙是否也有这样的福气。另外，王蒙在新疆呆了19年，我在文革后期也曾在新疆呆了一年半，我想我们对新疆的感受做个比较。

对第三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社会上曾有传言，说王蒙虽然划了右派，但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因此经常与他心目中的“真右派”划清界线。几十年过去了，王蒙终于苦尽甘来，不但冤案平反，衣锦还乡，而且创作热情如火山般喷发，著作颇丰。不仅如此，还“著而优则仕”，当上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及文化部长，至今虽年过古稀，头上还戴有全国政协常委的桂冠。这样一个人物，他对毛泽东如何评价不是很引人注目吗？

第一个问题，书中没说清楚。

第二个问题，王蒙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写得非常详细，读者因此而清楚地了解了王蒙的生活情况及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尽管身处逆境，他仍旧对生活、对未来充满热情，

永远不放弃希望。就像他19岁时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里面那些青年布尔什维克一样。建国以来，政治运动频仍，特别是1957年以后，多少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赶上文革延续长达20年的迫害，受害者数量就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倍。而王蒙不但身体精神都没垮，还能苦中作乐，小日子过得挺不错，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王蒙自身所具有的超强的承受能力。

第三个问题，看得出，王蒙对毛的知遇之恩是相当感激的，请看如下文字：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于《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我常想，毛主席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太重要太巨大了，无所不在。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不爱也罢，亲也罢疏也罢，毛主席的一切，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的天才与震怒，毛主席的深思与冲动，毛主席的豪情与机变，毛主席的一声咳嗽与一个笑容……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命运的一部分，喜怒哀乐的一部分，生的一部分与死的一部分了，也常常是决定性关键性“能源”性的一部分了。

他老人家的一切，决定着你的吉凶祸福，生死存亡。你的存在已经无法与他分开。你已经习惯于他的口气，他的文体，他的逻辑，他的振聋发聩的批示，他的令多少亿人一身冷汗的指责，……我必须强调，毛主席对我有直接的关注，他才是知遇，他才是慧眼，当然我这样说涉嫌过分高攀。他老人家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评价，对王某人文才的评价，对于我对于文坛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引人注目的……毛主席的一些谈话，毕竟对我的一生起了正面的作用。我永远感激老人家。

王蒙写文章特别爱用排比句，多的时候能一气用上几十句，端的是高山流水，淋漓尽致，大雨滂沱，气势非凡。这种“地毯式轰炸”效果非常强烈，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就是极其“煽情”。有些的确不乏深刻，让人感到颇有新意。但也因为排比句用得太多了，有时也显得滥俗或有卖弄之嫌。

但聪明如王蒙者，他不可能看不到毛给中国，给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规模的扩大，这种灾难早已是洞若观火，没有人看不见，也没有人能否认。知遇之恩理当感激，然而如果一方面是对个人的知遇之恩，一方面却是对广大人民的荼毒，两个方面同时存在，那该怎么办呢？

文革前，特别是文革中，对毛的歌颂是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如果什么人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对他老人家表示一点点的不敬，那一定会落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悲惨境地。君不见那些只是不小心打碎了毛的塑像，或是无意中把印有毛照片的报纸垫在了屁股底下的人，竟为此付出多年牢狱之灾的代价。今天，文革被官方彻底否定，尽管毛被免于与“四人帮”一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举国上下没有人不知道毛才是“四人帮”的真正后台。

我反复琢磨：在王蒙身上主宰他一切思想、言行的究竟是什么？马列主义？最多是些朴素而肤浅的马列主义ABC；民主主义？那就离得更远，共产党那套组织原则等教条早就统治了他的头脑；王蒙的主导思想充其量就是个“小资”，不是吗？你看他多么善于适应环境？你看他多么津津乐道于他所过的小日子？“那不是打成右派被迫的嘛！”有人会这样替他辩解。我说不一定。说得不客气一点，假如王蒙不是误打误撞倒了霉，他整起人来也是不会手软的。王蒙自己说，他与姚文元之流不同……王蒙确实没怎么整过人（我说“没怎么”是因为，王蒙自己承认他也曾因过于坚持原则以至于对不起某个同志），但人们注意到，在《王蒙自传》中他始终未有触及民主、自由这些重要的概念。一个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以追求自由、民主新中国为己任的进步青年，为什么会这样？恐怕并非偶然。

凭王蒙的敏感与机智，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些东西是犯忌的，是犯大忌的，即便是在今天——毛泽东不在了，邓小平也不在了，历史都迈进21世纪了，他仍然小心翼翼地躲开这些话题。为什么？他绝不肯放弃对他老人家表达由衷的感激，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感恩”。对这样的说法心存宽厚的人们也许会很不以为然：这是人之常情嘛，毛肯定了王，王难道不该表示感谢吗？甚至有人还可能会说，这不正是王蒙品德高尚的表现吗？你看，王蒙本人被打成了右派，受了很多苦难，但他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反而力求公正地评价领袖。问题是这么简单吗？王作为一个作家，他与别人、甚至是领导人的关系，或者别人、甚至领导人对他作品的评价，本来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问题在于，在1957年那么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在

刚刚作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余音尚在耳边时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发起了一场“不是阴谋，是阳谋”的反右派运动，5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从此偌大的一个中国竟没有人再敢吱一声。虽然王蒙也因为自己的作品被打成了右派，但他与其他右派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毛主席老人家曾经夸奖过王的文才，还说过保护王的话。即便是这样，王蒙还是没能逃过厄运，这说明了什么呢？有人想过这样的问题吗——凭着毛的巨大权力与威望，如果他真想保护王难道会保护不了吗？

这也许就是对第一个问题的真实答案。

我不禁想起封建时代臣子俯伏在地，诚惶诚恐说的一句话：“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想起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失败后，临刑时总要高喊的“天皇万岁！”那种时代里出现这种现象很正常。问题是，我们不总在标榜说，我们的社会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最民主的新社会吗？这个“新”到底新在哪里呢？

文革以后，据邓小平讲，毛自己说过，像苏联斯大林那样的违反法纪的事情，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王蒙被打成右派不承认、不服气，可能真有他的道理：他不是右派，他怎么能是右派呢！？问题在于，你认为你一心跟党走，你认为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党之心，可是党认为你有二心，你正在向党进攻，你就是党的死敌。怎么办呢？谁有评判之权呢？谁说了算呢？当然不是你，因为你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而个体往往是跟“个人主义”，跟“资产阶级”连在一起的，因此，在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辞典里，从来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个人的丝毫位置。

但我又要说，打王蒙右派冤吗？也可以说不冤。为什么？那要看你用什么标准衡量。如果你过去不了解王蒙，现在你应该了解了，至少通过《王蒙自传》可以了解了。你看王蒙同志多么善于适应环境，多么富于小资情调。王蒙为什么没受那么多苦难？他说是因为遇到了很多贵人（这种说法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未免太远了点），其实大抵是因为他天生的小聪明（见他与周扬谈话后的心态描述）。他尽管没能逃过毛的阳谋，但他比其他许多右派难兄难弟的境况还是好得太多了：有多少人身陷囹圄？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有多少人自辱自戕？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这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我无法想像，那些当事者或他们的后人，如果看到右派王蒙田园诗般的生活会作如何感想？

有人会说，那是人家王蒙懂得苦中作乐，你怎么能当真呢？也有人会说，那是人

家王蒙能以革命乐观主义面对逆境。你怎么看不出来呢？不，不对！还记得鲁迅怎样说过的话吗？他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便暂时失败，还是带上了镣铐，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于这生活。”

《王蒙自传》的封底有一段话：“一位智者的心得阐述：王蒙的人生坎坷曲折，多事也多难，但他处乱不惊一一化解，遇难呈祥，涉险成趣，令人叹为观止。王蒙在人生历程中处处表现出一位智者洞察世事的大智慧，丰富了我们的生存认知。”“大智慧”？这是在夸王蒙，还是在损王蒙呢？

本人父亲也被打成右派，从此本来和睦的家庭乱成了一锅粥。我当时年龄尚小，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直到1964年高考前经班主任老师暗示，追问家长后才知道实情。我并未因此而怨恨谁，而是虔诚地认为党是不会错的，需要改造的只能是自己。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努力改造自己，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竟然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我以为，这体现了党的“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之英明。文革爆发，我这样的人本来应该躲之唯恐不及的，而我却积极参加了运动，因为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的周总理现身说法太让我感动了，他说：一个人出身好只是一好，加上表现好才是两好。我想这不正是对我这样的人说的吗？现在看来，这该有多么天真！一个右派的儿子，谁能相信你对党的忠诚？果然，我被打“反革命”，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后才平反。与此同时，父亲的右派也得到了“改正”。十年浩劫过去，全党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反思，我也不例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浩劫？痛定思痛，人们普遍认识到民主与法治的重要。而这些仿佛跟王蒙没有多大关系。

《王蒙自传》不仅生活经历写得详尽而生动，语言也充分表现出王蒙特有的风格，还有一点特别值得称道，这种坦率特别表现在对自己家庭、自己父母的缺点、甚至是“丑行”的解剖上，这种称得上无情的坦率是非常难得的，他完全不顾“为长者讳”的古训，为的是让读者知道，“中国人怎样生活过”。

然而我还是要说，《王蒙自传》的最大缺点是缺乏思想，然而这怎么可能呢？说王蒙这样生活经历如此丰富的作家缺乏思想简直意近诬蔑，可是把这本《自传》从头到尾仔细看过来，确实看不到任何思想的火花与光彩。因此，王蒙的坦率不仅大大打了

折扣，而且显得有点儿可疑。👁️

【读片与读书】

《土地》：中国土改的教科书

启之

《土地》是农村片，农村题材是毛时代电影中最重要的一支，它担负着宣传党的政策、提高农民觉悟，推动集体化的任务。文革前十七年的农村片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进步与落后的故事。如《葡萄熟了的时候》《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另一类是阶级斗争，如《土地》（1954）、《暴风骤雨》（1961）、《槐树庄》（1962）等。

上述两类影片都离不开土地改革。土改是农业集体化的基础，农村生活的变化，农民的精神面貌、思想作为、进步与落后都与这个基础有关。土改也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序幕，这类影片都会按照这样的逻辑讲故事：因为土改剥夺了地主的土地财产，所以他们对新政权怀着刻骨的仇恨，对集体化极尽破坏之能事。

《土地》讲的就是土改的故事。当时中国正在一边倒地学习苏联，很想像苏联那样，拍大题材，搞史诗片。把三大战役、土改、抗美援朝、工商业改造等重大事件都搬上银幕。《土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上马的。

一、自信与期待

当时的顶层设计，是把这部片子拍成教科书。在设计者的想象中，这本书的读者应该是两种人，一种是中国人民，让他们认识党的力量；二是外国左派，启发他们学习中国的经验。

这前一种想象，是基于教育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想法：“巩固土地革命，认识意义重大，从农民方面看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此认识不够，把认识巩固起来，这才有政治力量。”¹

这后一种想象，是基于中共高层对中国特色的自信，和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展望，

¹ 这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郑位三对剧本的指示。见《郭小川全集》卷八，页206，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

他们预测：“广大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必将走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有必要“把中国革命的重要经验用电影的艺术形式介绍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宣传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宣传有关土改的基本政策和实施过程，以便供人仿效”。¹“中国的土改比十月革命后的土改更完备，规模更大，而且是在更落后的国家。应以此为中心任务，片子要发生政治力量，以此为出发点，以过去历史为材料，不然单纯写历史没有意义，越完成这两点，电影越成功。”²这种对道路、制度、理论的自信，显然比当下要有理、有力、有希望得多。

以往的经验似乎给这一想象提供了巨大的期待：“一部影片的放映，很快地便会接触到广大的群众，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据统计，舞台短剧《赵小兰》拍成影片之后，半年内的观众数目达1,400万人次之多，故事影片《一贯道害人道》半年观众数目是1,800余万人次。”³《土地》从题材上讲，要比《赵小兰》《一贯道害人道》重大一万倍，它的观众，只算中国人，也会达到几亿人次。

抱着这样的美好期待，中宣部、电影局和中南局为这部影片配备了最强大的创作班子：梅白、水华、俞林、李冰、郭小川。梅白，时任湖北黄冈地委宣传部部长，熟悉土改政策，了解地方情况。俞林，燕京大学毕业，晋察冀的宣传干部、作家，写过《老赵下乡》《家和日子旺》等小说，时任中南文艺学院副院长。李冰，中南文艺学院文学系教师兼诗人。郭小川，延安出来的著名诗人；水华，《白毛女》的导演。这五个人各有专长，政治强，懂政策；专业强，懂艺术。皆为一时才俊，当时的第一流人选。

这个班子奋力工作近三年，邓子恢、杜润生，周扬多次指导，剧本经过了六次修改。1955年影片公映，尽管大规模宣传，农村免费放映，还是没什么反响。

《电影评论》的主编马德波认为，这部片子在艺术上“不行，不好看”。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的罗艺军说它“很不成功的典型”。导演水华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不成功的作品”。电影史学家众中一词，说这是一部失败的影片。被遗忘，似乎是它最好的命运。

二、失败的原因

此片失败的原因，孟犁野说得最清楚：“首先是片面追求人物全、事件全。从历史纵向（历时性）来看，影片从1930年的土地革命写到1950年全国革命胜利后的‘土

¹ 马德波、戴光晰：《导演创作论》，页52，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² 《郭小川全集》卷八，页206，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

³ 《电影创作通讯》第11期。

改’，写了两代人在土地问题上的斗争。”“从现实横向来看，它企图全面地反映农村中各个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与斗争，既写了农民同地主的斗争，又写了农民内部先进分子与落后分子的矛盾，以及宗族之间的冲突；在地主阶级内部，又写了彼此的利害关系与斗争策略方面的一些分歧。”“还企图把土改工作的主要程序如清匪反霸、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露地主制造假分田的阴谋等，都塞入取景框内。影片还企图通过一部影片概括中国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20年间的斗争面貌，体现这种斗争的全部复杂性、尖锐性与艰巨性，写出农民和地主的‘最后一次决战’。”“其次是不适当地追求人物形象的高大。从新中国电影起步以来，凭空拔高人物形象的做法并非始于《土地》。早在此前数年的《刘胡兰》等作品中就有这样的苗头。但这种背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做法，在《土地》中更为突出。第一号人物谢成刚生来就会革命，从小就敢于同地主斗。‘老子英雄儿好汉，苦大仇深根子正’是这个人物的基调。”¹

孟犁野有一点没有谈到，就是在拔高正面人物的同时，丑化反面人物。郭晓蕙对此做了精辟的补充：“（对地主的形象）一是妖魔化，即丑恶、凶狠的极端化，二是完全的脸谱化。”²当然，这“二化”是毛时代文艺的必由之路，真实的地主形象，就像真实的贫农形象一样，在电影中是看不到的。

关于此片的失败，还有创作之外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国内思想批判。这部片子是在全国大批《武训传》，大批私营电影的形势下创作的，“这些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导致了在选材时对阶级斗争的极端重视和创作中对主题思想的政治性的片面强调。”³第二个原因，是苏联的影响。在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把文艺的典型归为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并将它与党性连在一起。这种“本质说”和“典型政治说”对《土地》的创作产生了影响。第三个原因是领导们的关心。据郭小川的笔记，从1951年到1952年管农业和管文艺的领导对创作有多次指示。

郑位三指示：“宣传要能激动人的感情，莫过于激动人的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再就是描写党领导农民有力量。”⁴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副主任的杜润生与创作人员谈话，要求“气派要大而深广，……结束过去的历史，开辟农村的将来。……要把人民解放军表现进去，剿匪、镇反均应写到。”“一定要表现党的政策变成农民所拥护的，（关系是）很融洽的”，“要表现无产阶级的作用，政策领导群众。”“要写革命的胜利

¹ 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页129—130，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² 郭晓蕙：《郭小川、水华的倾力之作——电影〈土地〉为什么失败？》，《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³ 马德波、戴光晰：《导演创作论》，页51—52，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⁴ 郭晓蕙，出处同上。

气概，地主阶级并不是容易打倒的。”

中共农民土地问题专家，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与创作组谈话，说剧本应该：“提高阶级仇恨，作为阶级教育，启发阶级觉悟，认识农民的创造力。”“要写恶霸、土匪、特务三位一体统治农民。要从清匪反霸写起，头两阶段可以交错进行，下层雇贫农开始不起来，开始是富农、中农起来。第一关是打垮恶霸，开头往往反恶霸……”

周扬指示：“要提高到理想化”，“要集中全力表现阶级斗争，战略上我方应占绝对优势，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垮敌人；要加强表现党的领导。重要的是工农联盟问题。”“写土改要从反霸、减租、退押写起……要写斗争的复杂和尖锐，消灭敌对势力很艰巨。……要使城市人民看到斗争的尖锐性。”¹

凡是懂创作的人都知道，这些大而空的指示，只能把创作引到邪路上去。倒是时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跟创作组说了一句内行话：应该写人物。“但是郭小川‘自恃有邓老支持，便对江青同志的话听不进去，很不尊敬地反驳了几句’。”“显然，拍过《白毛女》的水华和比较懂电影的江青，想从艺术规律出发，追求人物形象的塑造；而郭小川作为组长，坚持上级意图。最终，不一致的意见必须按领导意图达成一致。”

2

三、土改的意义

土改有两个意义。第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土改为解放军增加了兵源——分了浮财土地的农民，为保卫这些不劳而获的胜利果实参军打仗。土改成了农村青壮踊跃参军，争当主力的推动器，成了战场上解放军将士奋勇杀敌的冲锋号。《光荣之家》（东影，1950）一片中，国军俘虏问解放军战士，你们都是怎么当的兵。战士回答：“我们都是自动的。”那俘虏无法理解，还有人自动当兵。战士给他解释：“毛主席给我们分了地，可是蒋介石不叫老百姓活下去。我们为了消灭反动派，就都自动地参加了。”1950年这类片子拍了不少，《保卫胜利果实》（东影，1950）、《和平保卫者》（北影，1950）、《卫国保家》（东影，1950）等影片，讲的都是这方面的故事。子弟兵在前方打仗，后方的亲人自然要积极送粮送衣。因此，土改还是民工舍命支前的战鼓。从1950年代拍的《光荣之家》，到1970年代拍的《车轮滚滚》，讲的就是这类的故事。

¹ 《郭小川全集》卷八，“郭小川笔记”，出处同上。

² 郭晓惠，出处同上。

土改还对动摇国军的军心，瓦解他们的斗志起了不小的作用。国军的下层官兵都来自农民，听说家里也分了土地，这些人纷纷投诚反水。描写《大进军》中有这么一个情节：邱清泉兵团的通讯兵丁小二，因为在炮火中接通了电话线，被邱将军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但是，一听说家乡土改，给他分了地，他就带着四个弟兄和四支卡宾枪，投奔了解放军。

《槐树庄》的主题歌说得明白：“大炮响连天，歌声震山川。前方后方一股劲，掀倒那三座山。耕者有其田，农民把身翻。翻身全靠咱们共产党，大娘她走在前。”大娘之所以走在前，因为她的儿子当了解放军。

第二，土改为建国后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土地改革法》说得明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土改使“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中国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人民政府也依靠土地改革中形成的阶级队伍，完成了对旧的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²可惜，这个主人很快就成了仆人，1954年，中共推行以“一化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农业集体化进入快行道，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本来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中完成的社会改造工程，在短短的几年内宣告竣工。

农业集体化的深层目的，是国家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得到农业剩余，以实现工业化。得到农业剩余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统购统销。统购统销的主要特征是“违背等价交换原则”，“强制压低农产品购销价格”。

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土改是中国“三农”灾难的第一肇事者，它为农业集体化奠定了基础。国家顺利地 from 农民手中拿走土地，并由此造成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残缺，从而成为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灾难的始作俑者。

土改建构了毛时代的思想文化，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及学大寨等，都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的说法之上的。从土改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农村题材立了主脑，造了窠臼，勾了脸谱。讲述集体化的好处，批评单干，描写地富破坏，歌颂人民公社的影片纷纷走向银幕。

其实，郭小川对农民与地主的真实关系是心知肚明的——1945年，受党的委派，他回家乡热河省东丰宁县当县长，领导清匪反霸、土改分田、地方建政。三年后，他

¹ 齐鹏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35—3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² 齐鹏飞，页37。

写下了七万字的小说《潮河川的浪纹》的第一部《变乱》的前13章。在这位名诗人的笔下，“不少佃户和地主处得相安无事，认为按约定交租是守信用的表现，是应当遵守的为人处事准则。”¹

【序跋】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读《绕不过去的点》

丁东

无文兄积三十年之功，完成文集《绕不过去的点》，约我写一点感言。我通读全书，尤其是读了鲍彤、朱正、邵建三篇序文后，感到难以落笔。高人之侧，说出有新意的话实在不易。但无文兄坚持，我只好谈一点随感。

研究中共党史，可称显学，已经问世的书籍汗牛充栋。无文兄此书，仍让我耳目一新。我想原因有二：

一是入乎其内。中共党史堂奥很深。官方掌控核心档案，一般研究者无缘得见。苏联解体时，彼国的档案失禁，学者沈志华把握机会，个人斥资，搜集、整理、译介了一批与中共相关的档案，使中共党史研究的格局大面积刷新。可见党史中有待破解的谜团之多。无文兄的本业并非党史研究，只因为与罗章龙老人相识，罗章龙逝世后，其亲属又委托他整理罗老的遗作，吸引他步入中共党史迷宫，激起探微烛隐的冲动。

所谓绕不过去的点，时间上是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行为上是所谓罗章龙分裂党。的确，以这次会议为焦点，中共领导层发生了分裂。米夫布置王明等人上台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原来领导层中瞿秋白、周恩来等率先服从且全力支持，向仲发、李维汉等也服从，罗章龙等相当多的成员不服从，花园会议上争执无效，被共产国际宣布为反革命、叛徒，他们另行成立非常委员会，其中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很快被当局抓捕，惨死于龙华，十几年后被追认为烈士，罗章龙等不屈从者被永远开除出党，定性为分裂党，陈郁、张金保等人先后承认错误，留在党内担任高干。无文兄以罗章龙保存的史料为线索，深研相关者的命运遭遇，追踪到延安整风，又追踪到后任中共领导对罗章龙分裂党这一历史公案的应对。有人说，魔鬼在细节中。无文兄对细节相当敏感，他穷尽搜求，细致比对，终于从党史的迷宫中理出不少发人

¹ 这部小说载《郭小川全集》卷4。

深思的头绪。在我有限的阅读中，钻研早期中共党史达到此等深度者，凤毛麟角。

二是出乎其外。研究中共党史的立足点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党文化”系统里边研究，一种是跳出“党文化”外边研究。在“党文化”里边研究党史，有一个话语体系，就是何方剖析过的党史编纂学。它是党的意识形态基础。虽史学二字也在其间，实际上和古今中外良史传统并无关联。然而，这套话语在党史叙事里无处不在。人们时常看见，围绕党史人物事件的争议，唇枪舌剑，剑拔弩张，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其实双方都立于同一个基点，所争不过是谁属正宗，谁有资格进入英烈祠，围绕罗章龙的是非功过，最初也有人想在“党文化”里讨个说法。然而，此路不通。

曾经关注罗章龙问题的李锐老活到101岁。他晚年不止一次地当面对我说，正在思考三个问题，主义和理论是怎么回事，党是怎么回事，人类历史是怎么回事？他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又是公认的党史专家，他晚年痛感，必须跳出如来佛的紧箍咒。

2013年，张显扬曾和我谈起，中共党内主张政治革新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层次。有人止步于否定“四人帮”而维护毛泽东，有人止步于否定文革而肯定十七年，有人止步于否定“八大”以后的左倾错误而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有人止步于否定毛泽东而不反思中共的暴力革命，有人止步于否定斯大林而不反思列宁，有人否定列宁而不反思马克思、恩格斯，有人反思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反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哲学。他条分缕析出十二个层次，认为只有朱厚泽等少数大彻大悟者，跨过了所有十二道门槛，进入了彻底独立的思想境界。我当时建议他把这十二道门槛写成文字。他表示，和这些老人很熟悉，写出来恐怕他们对号入座伤感情。可惜，几天后他心脏病发作，突然辞世。

朱正的序言开宗明义提出一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个什么样的运动？这一问，问到了点子上。没有共产国际，中共的思想、组织、经济都成了无源之水。弄清共产国际本身是什么，它和中共的关系是什么，许多是非的纠葛、伦理的悖论、浴血的牺牲、民族的悲剧，都会看得豁然开朗。朱正先生不是执政党中人。他审视党史的心态更加清醒，眼光更加开阔。几则坚实的史料，便让读者看到，从列宁创建共产国际到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崇高的理想主义光环后面，有着极其冷酷的民族利益盘算。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信然。■

【序跋】

罗章龙与周伟德

——这也是“绕不过去的点”

邵建

无文兄传来他为早期共产党人罗章龙写的一本甄别性文字《绕不过去的点》，托“序”于我。我不敢。但无以拂其雅意，故从命。

我本人对罗章龙缺乏了解，不知何从下笔。想起去年无文兄也是让我看他写罗的一篇文章，我看过后微信上有交流，不妨过录在这里：

我：大作读毕，唯有慨叹。罗的思想资源基本上就是马克思一家，和那个周德伟正好形成一个对比。

文：我朋友另有一评：罗真正服膺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李斯特主义。诸如此类的评说：罗也不是全然批评自由主义，但对德国历史学派更为推崇（很喜欢引施穆勒）。此言是指他经济学的倾向，李斯特主义与德国历史学派是一体的。

以我看，罗在接受马克思的同时，又搭上了康德，如果要问在马与康之间，罗章龙更爱谁，可以这么说：终其一生而言，年轻时马学是入脑入心的，而血管里骨髓里流淌的还是康血，或者说“外马内康”。正因为深受马克思学说的影响，无论时间消磨多久，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上，在计划统制与自由发展两者间，很自然地倾向于前者，重国营而轻私营。

康德时代，讨论过市场化的自由经济与政府统制经济的利弊吗？似乎还没有吧。经济史上，那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热门，李斯特这派，是那个时段起来的。哈耶克稍后，开始唱反调，把自由主义引向更高。是不是这个路径，我还没完全弄清。

有一点，哈耶克被介绍到中国来，很迟吧，而且力度有限，是不是这么回事，邵兄更清楚。所以，拿哈当学术坐标，很难展开讨论，拿马、康当坐标，就直截了当。

我：不是讨论，而是慨叹，不同的思想资源可以成就不同的人。当年罗周如此，今天还是这样。

文：认识“革命”，思想资源恐怕不及目睹现实来得清醒，罗周都玩过革命，感受大不一样，以定型后的个人感受，再去接受不同的思想资源，后半截的成就完全不在

一个道上。

今天的人，是怎么认识“革命”的，思想资源被封闭了，亲身体验的是血是蜜也就自然地走向两端。

我：周在北大一年级，他的老师顾孟余给他推荐的书就是奥地利经济学一派，由此走上奥派经济学的道路。这还真是种偶然。其时他还谈不上对现实有什么态度，对革命有什么体认。

不妨就从这段对话开始吧。为什么读罗时我会想到名不经传的周德伟，因为这两人还真有一比：无论是他们作为个人，还是他们各自奉持的思想，包括他们之间的交集。

为妨先看百度上关于这两人的简介——

罗章龙（1896年11月30日—1995年2月3日），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和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周德伟（1902—1986）字子若，长沙人。经济学家、思想家，哈耶克亲传弟子。北大经济系毕业，1933年赴英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继又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所进修。1937年回国任湖南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40年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先后在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任教授，曾任台湾外汇贸易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冬，随国民政府搬迁来台。1954—1967年与屡次来台访学的哈耶克交流。1970年代移居美国，1986年逝于美国洛杉矶。著有《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译有哈耶克巨著《自由宪章》，其经济理论熔法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研究于一炉，以维新改革、宪政法治为指向。一生思想与实践皆力求以中国传统文化道统融贯自由主义传统。

罗周二人都都是湖南人，周比罗小六岁。虽然跨了一个世纪，但为同代人。两人都都在家乡完成中学学业，外语都是学的德文。两人又先后考进北京大学，先读预科，都在德文班，后又读本（罗1918年入北大，周则1920年）。更重要的是，作为北大学生，他们又共同面临当时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两人先后走上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政治”道路。罗章龙用他谙熟的德语追随了一个德国人马克思，成为一个终生的社会主义者，哪怕他1931年就被开除出党。周德伟同样用他熟悉的德语，追随了另一个德语学者奥地利人哈耶克，以后逐步成为20世纪中国极为少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价值对立的两种主义，它们正好各自体现在这两个湖南人身上。另外，他们后来都曾在湖南大学做过经济学教授，两个同乡又变成同事。

这里我不关心他们作为政治人的一生。此二位一是中共党员，一是国民党员，各自有其复杂的革命经历。我的兴趣在于，他们当初做学生时，是如何走上或被引上不同的知识道路和思想道路，以至最后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的。民谚“吃什么奶长什么肉”，同样，对年轻学子，读什么书往往成什么人。和中世纪不同，那是一个信仰的时代；现代则是一个“观念”的时代。马克思总是说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一元论的表述。对一个刚入北大如罗周之类的学子而言，他们作为一个未确定的存在，正在于他初始接受的是什么知识——人是教育的产物——形成的是什么意识或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他以后是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观念）决定存在。人的行为，如果不是出于本能，就是出于观念。但观念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教育，甚至来自具体的教育者，即老师。至于碰上什么样的老师，读什么样的书，走上什么样的路，这里还真有相当的偶然性。

罗章龙的精神导师是李大钊。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并未给罗上过课。但罗章龙他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的办公室却是他们集会的地点。“我们的研究活动得到了李守常先生以及北大一些进步教授、讲师的大力支持。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下午，守常先生在北大第二院大礼堂给会员们作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讲演。这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的第一次公开讲演会，参加的人除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外，还有许多尚未入会的人。他们都为守常先生的精彩讲演所深深吸引，反响很强烈。”（《罗章龙回忆录》）。在李大钊身边，团聚了包括罗章龙在内的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李梅羹等一批学生精英，他们都是中共第一代党员甚至有的后来成为党领袖。

而他们此刻的领袖，就是李大钊。没有李大钊，也就没有那个后来被称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不否定它也许会以另外的方式或面目出现）。正是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观念以及由此发变而为主的主义、组织和行动，决定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


周德伟则不然。相对年长于他的那些学生领袖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等，他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他所以走上和学长不同的古典自由主义道路，只在于他碰上了他一生敬佩的业师顾孟余（以及陶孟和）。还是预科时，陶孟和就推荐他读亚当·斯密，这促成他本科选择了经济系。在经济系他的上课老师就是顾孟余。“顾孟余先生主讲经济学原理，上第一堂课时就问：‘你们为何要学经济系’，学生皆寂静无声，顾先生曰：‘经济学不是教你们去发财的，不是教你们经营工商业或从事银行会计业务的，而是教你们如何经世济民。习经济须高瞻远瞩，注意全盘人民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加深其了解，从而培养自己成为社会的领导人才。此一学科，需要辅助的知识甚多，牵涉到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哲学、史学等知识，缺一不可，你们如无此等志愿或无力奠立巩固的基础，改习他科还来得及！’（周德伟自传《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在这一精神激励之外，更重要的是，德文老师用的就是顾孟余编的《德意志科学论文选读》，其中包括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克塞尔、韦伯等人的著述。除社会学家韦伯外，这本教材实际上就是19世纪70年代形成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论文集。顾孟余在每篇之末都撰写了作者简历及学说提要。这不仅是周德伟入经济学门之始，而且他一入门接触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奥派经济学”的知识。这里虽然没有哈耶克——哈此时自己还是个维也纳大学的学生，他也只比周德伟大三岁。但哈后来成为奥派经济学的第四代传人（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但是，从北大时期的门格尔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时的哈耶克，周德伟一步步走上奥派之路，成为中国第一个奥派经济学的学者。可以说，是顾孟余为本科一年级的周德伟埋下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周德伟离开北大后，在追随顾孟余从事国民党内的政治活动的同时，仍好学如昔，曾自陈：“余尽购大学课程之英德文之标准著作”，以下是一连串英文书目，如门格尔、米塞斯、维克塞尔、马歇尔、戴雪儿、阿克顿等，“细读之，一字不放松”。“又读完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周德伟自传）。在康德这一点上，周德伟和罗章龙一样。他们在本科时就很喜欢康德；而且读的都是德文。然而，一旦走出康德，周德伟的书目即从经济学到法学、历史学、政治学，俱围绕自由主义展开。

再看北大时的罗章龙排出的书目，除系统的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外，另有柏拉图、莫尔、卢梭、圣西门、傅利叶、欧文、黑格尔、尼采等。两种书目对比，大体就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谱系。如果从政治学的光谱看，读这些书的罗章龙只能是往左边走，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周德伟右行，不但右，甚至更右。他的书单使他走向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即古典自由主义）。

两个湖南伢子，两个北大学子，因读书不同，形成了两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思想与主义（一个要摧毁私有制，一个要保守私有制）。它们没有两个湖南人之间交战，却交战于广袤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为主义为思想，形成两个不同的政治、军事阵营，干戈相交，死去无数鲜活的生命。1920年代末，周德伟因国民党内派系相斗（周属汪系），流亡沪上。“一日余于小餐馆遇旧同学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相对唏嘘，彼此各知背景，不敢互示地址；感情如旧，形迹则疏。余感慨万千，深叹政争之残酷，泯灭人性矣。”再后来，据周德伟，二人又于湖南大学相遇。“罗后又改任国立湖南大学经济史教授，与余共事半年（时余任经济系主任），各能持平论学，无复党见。后事如此，何必当初。”（周德伟自传）

然而，没有当初，岂有后事。风无不起于青萍之末。同样的书生意气，同样的天下抱负，甚至同样的教室书桌；只是书桌上摆放了不同的书，书桌前的学子汲取了不同的思想。岂料“快哉此风”挟观念之力，吹出校门，吹向社会，“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溟渤，激颶慄怒。眩眩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这股狂飙般的历史飓风，搅天动地。待尘埃落定，一种观念战胜了另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战胜了另一种思想。“罗章龙”战胜了“周德伟”，尽管罗本人早已被误伤出局。

这就是体现在两个湖南人身上的20世纪中国史。决定这一历史的是观念，它通过政治、军事和国际力量之手，成功地造就了1949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存在。这是观念的力量。当年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不要小看观念。一个哲学教授在书房里炮制出的观念，可以摧毁一个文明。只是以上两种观念，哪个是摧毁文明的呢，哪个又是保守文明的？

2020年2月18日

【序跋】

《绕不过去的点》后记

无文

大着胆子闭门造车，一个个单篇，积少成多，一整本集子自编自排，有模有样，准备推“车”出门了。

自个怎么会“绕进去”的，前面大概说了；历来得到哪些指点帮助，多多少少也略有交代，不再逐一致谢。

我猜想，新老朋友们乍见这怪异而不乖巧的“车”，可能会有一种担忧——非同寻常的话题，沉重、敏感，三分雷区七分高压线，一年又一年，同管控方是如何周旋相处的？

事态没那么严重。本来就是关起门坐冷板凳，独自吭哧吭哧，与外界平淡无争。单位上的几任领导，全清楚下属的此项业余活儿，从未影响承担的工作，也从未惹出一星点儿麻烦。多年宽容的小环境，彼此相安，偶尔还能批准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偶尔也会简单交流点滴，保持着相互信赖，和谐共处。

当然，善意的提醒会来自不同的方面。亲朋好友多说上几句，没什么背后因素，且是伴着“加法”的调调，很乐于常听听。也遇过组织的关怀，说着说着就来“减法”了，淡淡地相劝别干这别做那，心知肚明，背后有苦心，只能坦荡地禀报，罗章龙始终是想成全这个党的。自己嘛，党龄也不短，不乏成全心，会笑着相问，共产党怕罗章龙什么呢？不至于吧。一度曾想讨个明确的指示，最好白纸黑字，让人好理解好执行。话说到这份上，到位了。确实，真就彼此打住了。

反复掂量过自己，原不具备专业素养，全凭兴趣，偏爱自由的学术，明白那是天下的公器，不再拘谨而敢于去抱一抱。内心惟两条：若公开发表，则谨慎于人家的规矩；若私下交流，则培养坦诚的讨论。由这两方面积累，观点、材料、逻辑，均图个清清爽爽。

要说回顾，就这么吭哧吭哧一路过来的。

本来还想就“民主集中制”花点精力，认真梳理透彻。主要想回答几个问题：它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时候才写进党章的？为什么要固化其中？终端焦点在“最高领导若犯了错误怎么办？”这次来不及了。还有一点也想深入研索一番，那就是罗章龙的

一整套理念，若付诸于全面实践，前景是什么？结局会咋样？讨论他的学术作为时，已触及这个问题的边缘，没有深入，问题留在脑子里了。

上述两项，一务实一务虚，理应绕不过去，尤为务实的思考，焉能揣着明白交白卷呢。务虚的那份又意味什么？既然重提起当事人欲争“百年是非”，重提领袖也认罗“政治上对的”，时过境迁，何为“是非”？何为“对错”？总不能停滞于迷迷糊糊的境界吧，随时代大潮给予新的评审，已不可或缺。

何日能吭哧完这两项，不敢预言。届时能补充进这个集子最好，单独成书肯定不可能。感觉腹稿不长，一旦敲起键盘，偏好“四两拨千斤”式的叙述，渴望一气呵成，献芹方家。

谢鲍彤、朱正、丁东、邵建四位赐序，感激在心。四篇序言新传开，已赞不胜赞，天南海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感谢新老朋友们的热情关注！借微信群友的诗句，默诵而化结语：何时举国风波定，不负春光好自由……

2020年2月

宅家避疫期间

【资料】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清华附中红卫兵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

有人污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污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党对毛主席有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

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儿、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得无法比！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的革命立场最最最坚定，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最最最热爱，我们革命之心最最最最红。”

我们有没有缺点？

有！

但这比起我们的优点来是次要的！

为了革命更彻底，为了我们红得更纯，缺点我们一定要克服的！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利，谁敢反，我们就坚决专他的政，要他的命！以前，我们这些“自来红”被那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王八羔子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我们的老子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他们的后代反而低人三等，连那些资产阶级小崽子都“不如”。今天，有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做主，我们“自来红”扬眉吐气了！往日我们矮三寸，今天是顶天立地的人！

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大小牛鬼蛇神斗到底！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反我们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瞑目！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放心，我们这些“自来红”一定要读一辈子您的书，听一辈子您的话，一辈子按您的指示办事，一定要把红色的江山给您保下来，把您的伟大思想红旗插遍全世界！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首都兵团《兵团战报》
1966年11月26日

【读者来信】

1. 赵晖：从毛对邓拓的批评谈起

看到271期中何与怀先生所写王若水先生文章中的一个细节，说点自己的看法，也算是对该细节做一点小考订。

何先生文章中写了毛泽东1957年4月批判邓拓一事，其中有个细节是“毛发了很大的脾气，甚至令人大惑不解的说邓拓像汉文帝”。我读到此也产生疑惑，印象中不少涉及反右的历史著作都涉及这个细节，但记述的内容都是毛说邓拓像汉元帝而不是汉文帝。如朱正先生的《1957年的夏天》和沈志华先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 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中均有类似的记载，称毛泽东批评邓拓“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为了确定这个细节的详情，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毛传和毛年谱都记载了这件事，但在具体内容叙述上都没有“邓拓像汉X帝”的内容。以官史的写作风格，应该是被删除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思想万岁》均无载。最后在《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查到一篇文献：“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批评”（1957.4.11），其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说的：“邓拓要好好当刘备，刘备会用人。我看你当了皇帝，会亡国。你很象文、景、哀、平。你不要把着毛坑不拉屎。”

因数据库未给出文献的原始出处，暂时还不知晓该文献的原始来源。文中的“文、景、哀、平”列举了四位汉朝皇帝，认为其与西汉亡国有关。但这种排列方法颇成问题，历代学者都认为文景之治为汉武帝时代的功业奠定了基础，从没有人把这两位列入亡国之君的行列。史家评论汉代后期皇帝，多认为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汉帝国由此走向衰亡。毛虽然论史自成一派，但一些基本史实和史论还是尊重的，对于上述观点也是赞同的。他在1957年6月和吴冷西等等人谈话称赞汉武帝雄才大略，称西汉衰亡始自元帝。因为元帝好儒学，摒弃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他父亲汉宣帝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再次提到汉元帝对西汉灭亡有责任，认为元帝用《诗经》治国，以“儒学”治国，所以其父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元帝的手中。毛认为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走向灭亡的。（陈晋：《从毛泽东的读史评论看“出主意，用干部”》）。

根据上述资料，可见毛对于西汉的衰亡史很熟悉。所以笔者推测，《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所记的“文、景、哀、平”是“元、成、哀、平”之误。有可能是毛当时口误说错，也可能是记录者的错误。

对这个细节的考证限于个人掌握的资料，只能到此为止了。但写到这里，忍不住要说，毛传和毛年谱的作者们，你们能不能少删除一些内容，让你们撰写的历史史实中少一些疑问和谜团呢。本期《记忆》的读者来信提到金冲及和高文谦，以两司马作比。我对此想说的是，在删改史实的恶劣程度方面，今日之官吏作者远胜当年的士大夫。借用毛评秦始皇的一句话，绝对是“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所以欲借助官方史料求真史，难矣哉！

2. 许绍吉：谈论文集并有问林彪事件

最新出版的《记忆》270期，是《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全四卷）的专辑，拜读之后，感到这一套丛书确实是文革研究的煌煌大著，专家云集，资料详尽，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海内外文革研究的发展。

《记忆》中的“编者后记”说出了该套丛书的艰辛不易，令人动容。在现在的年代，要想进行文革研究，简直就需要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笔者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笔者编有《文革英烈》三册。记录了当年英雄好汉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公安六条”的高压下，反抗文化大革命，最终被杀被囚的事迹。如果和当年的文革英烈们比较起来，现在的人们还有什么放不下呢？

这套书和美国的南方出版社纠葛之事，笔者到也可以提供一个佐证。当时《记忆》与美南对簿公堂，曾经问我能否出席阿拉巴马州的公堂，我虽有心，毕竟阿拉巴马距笔者有千里之遥，也就没有答应，只是提出：如果要找好一点出版社的话，本人可以帮忙。时常回想，总感到有负朋友，于心不安。如今，经过了编者的不懈努力，终于出版，也算是大幸。

文集之中，笔者尤其感兴趣的是蒋健先生的《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林彪事件文献著作述评》，赶忙找来拜读。蒋先生不愧为文革研究大家，见多识广。能够把这么多资料，娓娓道来，有评有析，拜读之下，受教不少。不过，有一个问题，想向蒋先生请教。

蒋文中有以下文字（322页）：

需要一提的是，汉纳姆还以 *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 为名将其调查报告发表在1994年2月2日出版的 *Asia week* 上，以《林彪秘辛大公开》为名发表在1994年2月6日出版的《亚洲周刊》上，内中解释了叶群的手袋中有避孕药的原因：或许怕怀上与她有染的黄永胜的孩子。

1994年5月21日，中国的《参考消息》登载了俄罗斯军队《红星报》报道的《林彪事件鉴定始末》，证实汉纳姆和劳伦斯的报道所言非虚。

从文字上来看，蒋文肯定了“叶群的手袋中有避孕药”这一个事实。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以前已经有人得出类似结论。

但是，蒋先生在《记忆》167期上发表了文章《“林彪强行与叶群发生性关系”考——兼谈王海光的“历史生动性”》。文章的内容，就是证明了“避孕药被放在那个女人的口袋里”的说法“很不靠谱”，有着“显而易见的漏洞”。主要根据是叶群的衣裤已经烧毁。比较蒋先生的两处文字，蒋先生否定的是“口袋”，肯定的是“手袋”。查李安定的两处文字。

《林彪头骨今安在？》（《湖北档案》，2004年11期，34页）的文字如下：“于是，彼得告诉张宁，在坠机现场的女尸口袋里发现了避孕药，并道出他的疑问：叶群会不会经常服用避孕药？”

《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视点》，1994年第6期）的文字如下：

有一个人对我说，他对林彪在这架飞机上的说法表示怀疑，当时他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一天深夜，他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命令他立即穿上衣服，过十分钟有汽车来接，随后，他被带到安全部，关在一个小屋子里。有人给他一张印着英文的纸片，让他立即翻译成蒙古语。看着纸片，他十分惶惑，这只是一张避孕药的说明书。上面是药效和服用方法。看过译文，安全部的人笑了。事后他们告诉他，避孕药是放在那个女人的手袋里的。

是否应该说，蒋先生的两处文字的结论不同，原因就在于“口袋”和“手袋”的

差异？叶群衣服烧毁了但手袋并不一定烧毁。希望蒋先生能够释疑。

蒋先生的《“林彪强行与叶群发生性关系”考》中有一处并不很妥当。文字如下：

友人则向笔者解释：“如果汉纳姆确实对张宁有这么一个访谈，他们之间的交流应该有第三者在场。我和张宁有多次交流，这些情节从未听闻过。张宁有一次提及在香港见到汉纳姆，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深谈。”

给读者的感觉是，汉纳姆的文字不可信。但是，《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有一节“纽约金色池塘张宁娓娓道来”，其中有文字：

有朋友告诉我，张宁正在纽约，她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当年的未婚妻，是少数几位最后见到林彪的人中的一个。朋友从一位华人饭馆老板那里找到了张宁的电话号码，在她帮忙安排下，我和张宁在广场饭店见了面。

所以，汉纳姆采访张宁，是在纽约，而非香港。当然，笔者以为，这是由于蒋先生的朋友对某些事情了解不多引起的。

另外，1994年5月21日《参考消息》的标题为《俄〈红星报〉援引当事人披露：林彪遗骸是怎样鉴定的？》，而非《林彪事件鉴定始末》。而且，文章只是谈及“林彪遗骸是怎样鉴定的”，并没有谈到“避孕药”。当然不排斥笔者看到的文字已经有所删节。如果蒋先生能给出原文，更为感谢。❏

3. 王芳纠错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第一卷中关于地方文献的那篇文章，谈到湖北的著述时，有两个地方似乎有误：

(1) 陈再道的《浩劫中的一幕》，我认为不属于学术著作，或许称回忆性文字或回忆录更恰当？

(2) 《记忆中的底层文革——关于“文革”时期武汉钢工总的口述历史研究》，是我的硕士论文，而非苗立峰。我想您这个出处应该来自于金大陆老师的一篇文章，即《关于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和前景》。金老师的文章当时发表时，我大致浏览了一下，竟然也没发现这个问题。❏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

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